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7月15日第20期 总第23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30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二十三）

目录

【专稿】

王复兴 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考

【述往】

郭娜嘉 谁害死了北大才女

——汪静瑜“自杀”之谜

俞小平 被工宣队踢出北大之后

——山西繁峙水泥厂琐忆

郑世忠 难忘1969

左伯莉 武斗惊魂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五）

——逝者血泪·孙泱之死

【考证】

樊能廷 “新北大公社”打压“井冈山兵团”的“千钧棒”（下）

——《新北大》关于“红旗飘、牛辉林”的评论

【文摘】

杨 勋 北大“四清”试点

【资料】

把聂三六拿来示众——聂元梓三月六日两次汇报批注（《新北大报》1968/3/22）

【本刊声明】

【专稿】

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考

王复兴

一、1967年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并辞职

1967年二月、七月、八月，聂元梓曾在不同场合三次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本人辞去校文革主任一职。此事是北大文革史中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但却长期被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们所忽略。此事是否发生过？此件在当时看来的逆天之举，其背后的动机究竟为何？其后果是什么？此事对北大的文革运动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探究。

2018年4月25日上午十点半，我到聂宅看望聂元梓老人，向她讨要她新出的书《我在文革漩涡中》，同时约了她儿子大胖聊天。老人已97岁了，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说话缓慢、吃力，但精神尚好。笔者获赠新书后，主要是和大胖交谈。大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一个多小时，话题只有一个：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忽略了聂元梓要解散校文革这件事。大胖认为这件事是北大文革中一件具有根本性质的大事。聂元梓后来挨整；陈伯达6.5讲话挑动北大分裂；8341、迟群、谢静宜进北大后狠整她，皆与此有关。文革之初，“最高领袖”给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那么高的荣誉，把她树为文化革命的一面红旗，她却要中途“撂挑子”，想退出运动不干了。在中央眼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上面”、还有中央文革会怎么看这件事？“上面”应是很愤怒，于是一直整她，但又从来没有公开批评她这个问题，从未提过，这是为什么？因为不能明说，影响太坏。大胖说这些话时，她母亲默默地坐在一旁听，没有打断大胖，也没有说出任何不同看法。此时我猛然想起，14年前，2004年夏天，我在文革后首次拜访聂元梓时，那时她记忆力很好、头脑清晰。那次她曾很

认真地对我讲起，她当年曾公开提出解散校文革、本人辞职一事。认为这件事很重要。我前、后联系起来思考，认为大胖对我所谈，是表达了聂元梓真实的意思。

2014年4月一次在北京与校友聚会时，我曾向中文系校友索世晖提及此事，索马上反应：“确有此事，时间大约在1967年2月底，地点在临湖轩。我参加了这个会，会上聂要解散、辞职，遭到一致反对。”索的回忆印证了我的记忆，确有此事，我们俩人都在场，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个会议是聂元梓召集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各系战斗团团团长及部分战斗队代表的联席会议。记得我当时还寻思：“她怎么这么糊涂？！”索世晖当时是“公社”的中文系战斗团团团长。他后来于2018年5月与我聚会时再次议及此事，回忆说，在那次临湖轩开会之前，有一天在聂元梓办公室，有他、聂元梓、魏杞文，她靠在沙发上，说文革太复杂了，自己领导不了学校运动，想建议解散校文革，自己辞职，不当校文革主任了。当时魏杞文坚决不同意，反复劝说她……

以上即聂元梓于1967年2月底第一次提出解散、辞职的建议并被“公社”的群众否决的情形。此后，聂不甘心，又两次提出该建议。她在《我在文革漩涡中》（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10月出版）一书的264页至267页写道：

说实在的，文革初期，我曾经兴奋过，以为有了真正发表自己的意见、改善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了。但是，此后的运动发展却使我越来越困惑。到了夺权阶段，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产生怀疑以后，我就产生了退下来的想法。我觉得，把那么多老干部统统打倒，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武斗越打越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作为北大校文革的主任，自己对许多事情都想不明白，还怎么领导全校师生员工把运动进行下去？

既然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认为搞糟了，对毛主席信任和重用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产生了怀疑，我就逐渐不愿意紧跟毛主席了，我对毛主席的崇拜思想开始动摇。

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天（大概是6、7月），……。我去看杨惠文，和杨惠文说了这些想法，想从运动中退出来，不干了。杨惠文说，你别看现在搞得这么乱，毛主席到时候有

办法收拾。你要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要是想退下来，最好是想个办法，说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最好现在就不要再出面了……。杨惠文劝我退身避祸，这些话说得都对，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了。

按照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到一九六七年夏天，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该夺的权也都夺了，该回到正常的秩序上来了。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我做了学校里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的工作。虽然我个人尽了很大努力，但是终于没有成功，派性越来越厉害，全校的局势恶化。全国各地都是群众组织分裂，发生严重武斗，“文化大革命”形势十分混乱。

我认为这样继续下去，结果必然难以收拾。在一次校文革常委会议上，我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照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根本无法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局面。因此，我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了。我提议，我们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说明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都无法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请求毛主席批准我们自行解散。另外，校文革常委个人，自己谁愿意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选择参加自己拥护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我自己是不想干了，我要退下来。”当我讲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要求校文革自行解散的意见以后，校文革常委里马上有人提出反对，说我低估了“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说“校文革”成立以后，常委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结果，大家都拥护这种意见，我要求解散校文革的提议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但我还是没有改变主意。过了没几天，八月中旬在有周总理出席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接见会上，我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当时，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很严厉地训斥我，周总理和别的人都默认了江青的话，没有发表不同意见，我怎么办？其实我不是怕有人攻击校文革，而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我想退下来都不行啊。我要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

早就撻挑子了。毛主席肯定过我们的大字报，给我那么大的荣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是毛主席提出让我负责成立“校文革”的，我不胜任、不想干了，也不能一甩手就下台，不能随便撻挑子，必须经过中央批准。我的党内组织观念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既然江青明确表示了态度，周恩来等领导人也都默认了要我继续当校文革主任的意见，我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沉浮，不可能不犯错误。

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中，我讲了当时我的这种思想状况，我说，一九六七年秋季以前，北大校文革所犯的错误不论有多大，我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认真检讨。但是，从这次接见会上（周总理在场），江青不准我辞职，形势所迫，我不想干都不被允许，那么，对这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无论错误多小，我一分责任也不负……。我是完全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被逼无奈，勉为其难。

以上即聂元梓于1967年7月在校文革常委会、8月在中央文革接见会时，第二次、第三次提出解散、辞职的情形及其心理活动。这些史料，将来研究文革史的人们可在中央文革小组相关的接见会议记录中以及聂元梓刑事审判案的预审记录中，进行核实。

聂元梓做为一名行政级别十二级党的高干，做为一名曾经历过延安整风并在“抢救运动”中曾“被抢救的失足落水者”，她的想法与一般的大学生自然不同。她当时内心深处的想法是什么？在革命的狂飙年代，她有什么“阴暗心理”？大胖于2018年4月25日对我的长谈中有深入披露。

大胖说：“1967年夏季，我妈每隔一、二天就在晚上带我去杨惠文家（聂与杨惠文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无话不谈的好友。）我妈和杨惠文、白介夫（杨的爱人、老干部、北京市革委会成员）三人议论时局，观点一致。三人共同认为：当前是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左倾错误，政策太左了，打倒一大片，比延安整风还厉害，还左。我听了大人的议论，万分震惊！（大胖当年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大胖还说：“我妈说，准备向中央提意见。杨惠文、白介夫警告她：‘不可以！如果你这么干，会把你整死，你孩子也得死。绝对不行！’

但你可以想办法退出运动。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辞职不干可以试试。”聂元梓放弃了风险太大的“提意见”的行动计划，而尝试解散、辞职、退出运动。

2016年4月初我回北京探亲，曾于4月10日、27日两次看望聂元梓和她的儿子大胖（于晓东），并与大胖进行了详谈。我问大胖，聂当时认为中央文革打击一大片是错误做法，这想法怎么形成的？大胖说：背景是当时社会上各级领导已全被炮轰、打倒、瘫痪了。母亲认识的所有亲戚、朋友、老领导凡是高干的，全被打倒了。她姐姐聂元素（大胖的姨）让老保姆把她被打的血衣送过来，托话：‘如果我死了，绝不是自杀，说是自杀别信。’（聂元梓一直保存这件血衣，后来工宣队抄家时搜出这件血衣，批判聂有阶级仇恨，要翻天算帐。）大胖的三舅（聂元梓的三哥）在北京内燃机厂当副厂长，曾向聂元梓哭诉，说他在厂里被批斗，挨打，受折磨，哭着要聂元梓向中央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

聂元梓说：文革其实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我想，她这话有一定道理。在中央层面，除了他老婆及个别人，谁会在内心与他真正一致？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表面上跟的最紧，内心的真实想法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照林彪，也就不难理解聂元梓的真实想法。以上披露的就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的真实的内心世界。文革之初，只有单纯、幼稚的大、中学校学生，才会被狂热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所煽动，所裹挟，一哄而起造反，但他们逐渐也冷静了下来，不断地思考，逐步走向了觉醒。到了1976年9月初，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他便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人一走，天就变了。

二、新北大公社1967年的反左倾向

1967年，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本人辞去主任一职。表明她在内心深处对文革的不满与抵触。因而在领导北大运动时，便自然地表现出反左的倾向。这是一表一里的关系，反左是表象，里子是对文革不满、抵触。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是许多复杂事物的共同现象。1967年，北大文革运动的主要政治倾向：两派共同反右倾机会主义，共同批判刘、邓资反路线，共同炮轰中央及各省市的走资派，共同坚持反陆平、反工作组。这是大潮流，无人敢逆流而上。然而在这一主要倾向的另一面，以聂元梓、孙蓬一为首的北大校文革以及“新北大公社”的骨干力量，确实存在反左倾向，这是历史事实。这是1967年在北大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

由于聂元梓在内心深处对文革很不理解，有抵触，于是在领导北大运动时便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她三次公开提出解散校文革、本人辞职不当校文革主任即是证据。提出文革委员会解散、辞职，这在中国文革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事件。此事没有实现，如果实现，定会惊天动地……正因为聂元梓对文革有所抵触，因此在领导北大的运动时，表现为保守，反左。被江青于1967年1月16日批评为：“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笔者认为聂元梓的最大错误，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政治思想之错。这是聂的“最大错误”，但笔者并不否认聂元梓、校文革在1967年1月以后仍犯有其他错误。聂元梓、孙蓬一、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师生在1967年1月以后曾继续追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批判“走资派”。校刊《新北大》也曾刊登过“揭发”“批判”党、政、军领导人的文章。但必须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判，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脱离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环境，须事实求是地进行分析。正值文革高潮时期的1967年，全国人民狂热崇拜毛泽东，全国上下炮打刘邓司令部，这是大气候、大潮流。北大两派师生，包括聂、孙，都只能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炮打“走资派”，否则就是立场错误，“大逆不道”，甚至会粉身碎骨。问题的关键点是，是否早在1967年，聂元梓、孙蓬一、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曾经有过鲜明的反左倾向、反左潮流？历史的事实是：它确实发生过！存在过！当年的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反左，不仅是他们头脑中的兴奋点，也

是他们行动中的用力点，这样做在当时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因此人们非常注意策略和隐蔽性。早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此一在北大文革中出现的闪亮的历史正能量，难道不应把它挖掘出来，做为益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发展史的健康因素，予以认真总结吗？

应该如何历史主义地看待北大文革史中聂元梓的反左？哲学家王若水的分析很中肯，王若水在《聂元梓回忆录》的《序言》中指出：“聂元梓在‘文革’期间采取了抵制和反对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立场。她作为一个有政治经验的老干部对当时许多问题有自己的考虑，而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是和那些单纯的、狂热的红卫兵不同的。尽管如此，她却不能摆脱当时流行的对毛泽东的盲目的个人崇拜，不能不追随毛东参加“造反”。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到了后期，她也陷入困惑之中，想要摆脱却身不由己了。”王若水对北大运动很了解，其分析亦客观、中肯。

新北大反左，此事的权威性证据，即江青于1968年初多次批评聂元梓：“我让你反右，你偏反左！”1968年3月2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宣布打倒杨、余、傅。首都红代会代表列席了会议，北大聂元梓、马云龙参加了此会。江青在大会发言中说“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并批评聂元梓“我要你反右，你偏要反左。”第二天马云龙在北大广播台传达了“3.22”林彪、江青的讲话。（2015年4月笔者在北京与马云龙当面核对了江青在此会议讲的这句话。马说江青确实讲了这句话。他记的笔记。）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打倒杨、余、傅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讲话时，又一次公开批评聂元梓，说“聂元梓谁的话都不听，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次大会上中央首长的讲话记录，一定还保存在档案中。档案总有解密的一天。

就在江青多次批评聂元梓反左不反右的那段时间，聂元梓在俄文楼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号，我们提我们的政治口号，当前不是右，而是‘左’。我们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是要反‘左’。”（引自《聂元梓回忆录》中《我的上诉状》）这证明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极左已上升到一定程度的自觉状态。而当年新北大这种反左的立场，是上下一致的，例如“新北大公社”

的“红梅战斗队”就曾于1967年5月底贴出过一份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大字报《评反革命极左思潮》，指出反极左是斗争大方向。把“极左”加上“反革命”的冠词，是暗指林杰、关锋是吴传启后台。

今天反思文革，当年反左无疑是个正确方向，因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就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新北大坚持反极左，是朝着正确方向逐步觉醒。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孙、“公社”群众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还跳不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这个大框架，也认识不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是毛。

当年新北大、聂、孙反左，集中表现在反吴传启，反王、关上。当时不可能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关锋，因此新北大、聂、孙的策略就是公开地打击王、关的马前卒吴传启，以此来抵制其后台王力、关锋。但这并等于主观上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而当时“公社”总部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江青”。但客观上是反了中央文革路线的。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

下面捋一下聂、孙、“新北大公社”直接反王关戚的史实。看看1967年3月下旬、4月10日、5月27日、6月1日、6月5日，先后发生的重要事件。3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李玉英到解放军报社找李讷，向李讷着重谈了有关林杰、王力、关锋等人的问题，递交了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王力、关锋两次打电话向孙蓬一施压的电话记录。4月10日，聂、孙求见中央文革后去了钓鱼台，见了江青、陈伯达，向江青告状，告了王力、关锋。孙蓬一在接见时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5月27日，陈伯达在钓鱼台单独召见聂元梓。关锋、戚本禹在座。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我们非常希望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关锋则威胁说：“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的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聂元梓始终没做一句检讨，会面不欢而散。（据《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二章第3节，聂在书中说此次接见是5月28日，有误，经核对是27日。）这次“5.27”谈话十分重要，

有几点值得注意：1、陈伯达明确让聂元梓“不要反吴传启了”；2、陈伯达以陶铸为例，指出反吴传启就是反关锋；3、陈伯达要聂与中央文革“合作”，隐含政治交易之意；4、如果聂不听话，不上他们那条船，会怎么样？关锋出面把狠话撂下了：“再犯大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这是对聂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文革后的2004年夏，聂曾对我讲：“中央文革、陈伯达要我上他们那条船，我不肯。于是整我。”聂所指，应是此次“5.27 接见”。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从1967年3月至6月，多次向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厅递交了反映吴传启等人问题的材料。6月1日，“除隐患”以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吴传启的第一批材料。仅仅五天前，陈伯达刚刚于5月27日对聂讲过“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的（指中央文革）与他们（指吴传启等人）联系起来。”可是仅仅五天之后“除隐患”便公开炮打吴传启。

在陈伯达眼中，聂、孙、“新北大公社”太不听话，于是在6月5日陈伯达发表了两次谈话（一次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大饭厅，一次是6月5日晚至6日凌晨在人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时。有校友说只有一次讲话，是在人大会堂，但据笔者考证是两次讲话，与聂的记忆一致。），陈在讲话中狠整聂、孙、狠整“新北大公社”。

6月5日晚至6日凌晨，陈伯达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如此上纲上线，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

在6月5日晚上陈伯达于大会堂讲话之前，在6月5日清晨，他曾首先到北大大饭厅，对聚集的学生和闻讯赶来的聂元梓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不行啊。没有波浪有什么意思？”，“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回忆说：“校内反对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对北大发难，对我发难，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6.5’讲话。”

（《聂元梓口述自传》第十五、十六章中，引自博讯文坛，编者谢冀亮）。

6月5日之后，6、7、8日三天，“井、团、零”出世，与5月建立的“红、飘”汇合，形成了有规模的反对派，后来组成“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中央文革、陈伯达以这种方式牵制、阻挡新北大反左、反王关戚。你新北大不听我中央文革的，我就让你后院着火，分裂！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主要是在校外，而不是针对校内，是矛头向上。斗争方向是反极左。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广大群众是冒着巨大风险，以进攻态势反吴传启（明反），反王、关、戚（暗反）。在当时的形势下，新北大反左、反王关戚，不可能公开亮明旗帜，只能以曲折、隐蔽的方式进行，因此是被掩盖的一种倾向。同时应指出，当年北大“井冈山”的许多师生也曾对林杰、关锋、谢富治不满，有着反左情绪，但总体上远不如“公社”强烈。

新北大、聂、孙与学部联队吴传启之间从1967年1月夺权风暴开始出现的斗争及其发展，笔者在下面择要捋一下：

1967年1月新北大奉周总理指示到高教部夺权。碰上《红旗》的林杰、学部联队的吴传启、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搞小圈子夺权，拉一派打一派，支持高教部“延安公社”的卢正义夺权。而卢正义有历史问题是叛徒，确实在狱中出卖过同志，因此遭到聂元梓、新北大坚决反对。而后王力、关锋严厉批评了新北大，聂元梓随后带领北大师生撤出了高教部。

1月15日，学部民研所的洪涛、刘郅在学部吴传启支持下，把全国政协和统战部的机密档案抢劫一空，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民族学院以郑仲兵为首的“抗大公社”和统战部群众把洪涛、刘郅等人扭送公安部，洪、刘却得到了谢富治的保护，第二天就把人放了，并发表讲话封抢档案的人是左派，反过来把反洪涛打、砸、抢的民院“抗大公社”的郑仲兵关押了十几天。郑仲兵到北大找聂元梓串联，得到聂元梓坚决支持。从此，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与聂、孙、“新北大公社”成为反吴传启的坚定战友，并都对谢富治不满。

4月8日，在民族宫批判修正主义民族路线展览会的筹备期间，地院“东方红”等高校的地派，在学部吴传启、洪涛等人支持下，于8日下午包围了北大学生进驻的民族宫，对

“新北大公社”学生实行武力清场，于9日凌晨3:30把北大学生全部赶出了民族宫。北大校友扬子浪在其公开发表的《文革日记》中，对此有详细纪载，他是武力清场的受害者。他在日记中写下，他认为地派武力清场的后台是：吴传启、洪涛、卢正义、徐非光。当时有北大学生在民族宫，亲眼看见了洪涛在场。

4月11日下午，地院“东方红”等六所高校的宣传车，闯入北大，大喇叭高喊：“新北大公社是新保守派！”“聂元梓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后来外校地派这六辆车被北大学生扯掉了广播线，变哑吧了，并把六辆车推出了北大校门。

“4.8”、“4.11”事件表明，由于新北大公社、聂、孙反对学部联队潘、吴洪一派到处伸手抢权，搞打、砸、抢，因而他们便拉一派打一派，煽动地派学生反新北大。反新北大的后台就是王、关、戚、谢。

以上通过1967年1月至4月的一连串社会冲突事件，表明聂、孙、“新北大公社”在1967年已从反右转向反左，从反社会上的极左思潮，走向反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吴传启、王、关、戚、谢富治。孙蓬一的“4.12”演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4.11”地派六辆宣传车闯入北大挑衅后，北大师生群情激奋，孙蓬一于4月12日在大饭厅召集“新北大公社”全体大会，并发表演讲。这个演讲是反极左、反吴传启的宣战书，不指名地抨击了学部联队一派的后台王、关、戚。孙在演讲中说“真正的‘摘桃派’”“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孙指出他们的手法是“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指出他们在搞小圈子，排斥异己，到处伸手夺权。孙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显然不是指吴传启等人，他们不够资格、不够份量，而是指“大人物”王、关、戚“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4月12日孙蓬一演讲之前，有一个小背景：聂元梓在其《回忆录》第十一章第6节中写道：“晚上，我召集了校文革及其他有关人，有孙蓬一、李清崑、姜同光等（记不清还有谁了）开了五、六个人的小会，让他们对当前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清醒认识。

我讲了文革形势和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的问题。”（注意，聂点名讲了四个人的问题）孙蓬一的演讲，是把聂、孙等人小范围的议论，捅到了大庭广众之中。此一背景证明了：孙蓬一的演讲，其矛头所向是非常清楚明确的。

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于1967年反极左，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是北大文革史的一大亮点。新北大当时客观上已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主要的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主要矛头不是指向党、政干部中的“走资派”，而主要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政治倾向主要不是反右，而是反左。但在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毛主席、中央文革的革命路线，这是其历史的局限性。

三、结束语

北大的文革运动不同于清华、地院、北航、北师大。这四所大学与其他绝大多数高等院校一样，是学生领袖领导着文革运动。而北大不同，由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背景是北大的社教运动及后来整社教积极分子的“国际饭店会议”，因此在文革爆发前夜，北大便已形成了一支以哲学系干部、党员教师为骨干的造反派力量。第一张大字报的七名作者，便是由这些人组成。而清华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主要是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多天”内由反王光美、叶林工作组的蒯派学生为主力，在反工作组的斗争中所形成。因此清华的运动便由蒯大富等学生领袖主导了。

在北大文革前期的两年多时间，领导北大文革运动的是以聂元梓、孙蓬一为首的一批党员干部、教师、研究生，而不是学生领袖。因而北大的运动便相对地理性，并不激进，并被江青于1967年1月16日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为：“太温了”；更被对立面“井冈山”攻击为“保守”，是“最大的保守派”。“井冈山”是站在左的立场，批聂“保守”。“井冈山”的主流思潮是：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彻底砸烂旧世界。认为聂、孙、校文革、“公社”是“旧世界”，要“砸烂”。因此提出：“二次革命！”“全面夺权！”的口号。这

两个口号当时曾被“井冈山”贴满了全校园。“井冈山”与“公社”，当时分别表现为一个偏左、激进，一个偏右、保守，当时的北大政治生态即是如此。但应指出的是：“公社”的师生同样在阶级斗争观念的浸染之下，视“井冈山”的同胞为“敌人”，誓要将对方摧毁、吃掉。两派没有政治正确的一方，都错。

校文革、“公社”偏右，这是由北大校文革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特点。对于这种区别，举个例子，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学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第一批红卫兵（人们称为“老兵”）在北京市到处打人，甚至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市公安局披露的数字）。而同样由高干子弟为骨干所组成的大学“保守派”红卫兵“一司”、“二司”，却很少有打人的记录，更无打死人的事例，只是坚决“保皇”而已。这便是由于年龄的差别、文化程度的差别，而表现出的不同的理性程度，或者反过来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非理性的激进状态。

北大的文革运动有其独特的特点及特殊性，这是由其物质基础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再比如孙蓬一的“4.12演讲”，便不可能由学生造反派头头口中道出，包括同是天派的蒯大富、韩爱晶，他们还不够成熟。孙蓬一的4.12演讲，以大无畏的反潮流姿态，反左，明反吴传启，暗反王关戚，对北大、对北京市的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下令关押王力、关锋，实行重大战略调整时，对北大大多数师生而言，已具备了充分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准备。笔者和许多“公社”的师生们当时听到王、关倒台的消息，便一片欢腾、欢天喜地，特别高兴，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

本文开篇时所述大胖对笔者所谈：聂元梓在文革中提出解散校文革、本人辞职，是北大文革史中的重大事件。她后来挨整、北大分裂，中央文革挑动反聂反校文革，以及新北大反左、反王关，迟群进校后狠整聂等等，皆与此事有关。对此，笔者深以为然。笔者认为：抓住这一关键史实，由表及里，认清其实质，前前后后许多事情就豁然贯通了。■

2018年6月3日

【述 往】

是谁害死了北大才女？

——汪静瑜“自杀”之谜

郭娜嘉



看着照片中这群身着女附中校服青春洋溢快乐的姑娘们，思绪回到了1962年的夏天……

那时高考刚结束不久，我们北师大女附中高三（五）班的部分同学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的向往，相约来到颐和园。我拉着手风琴，大家边走边唱，边畅谈着各自的理想。“汪汪”我们都这样称呼她。

她不仅是我们的皮肤白皙的一位漂亮姑娘，更

（前排中作者后排右二：汪静瑜）是一位智力超群的姑娘。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这辈子所遇见的最聪明的姑娘。在当时人才荟萃的师大女附中，她就如同鹤立鸡群。上课时，她常常是偷偷看着各种课外书籍，包括我们传阅的各种小说。但不管老师什么时候把她提溜起来，也无论问什么问题，她都对答如流。她还很乐于助人，

在自习期间，同学们习惯有了难题就去找汪汪，她竟然从没给难倒过。汪汪是个全才，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高三才开始学拉小提琴的她，在进入北大后就成为北大管弦乐队的中坚力量。看着十分矜持的她在扮演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溜须拍马谄媚的大臣时，让我们的女校长笑得流出了眼泪。那是一个如此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花样年华！可那也是一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女附中的老师有惜才的传统，恐怕这才是女附中在成千上

万的中学校中能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之重。听说汪汪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为了汪汪不会在未来的大学录取和大学生活中受家庭成分的影响，老师授意班里的团组织把汪汪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之一，并在高三入了团。

我们女附中是62年全国高考冠军。当年我们班报考北大的只有3人，我和汪汪考上了。她在物理系，我在无线电系，我们在物理类四个系一起上大课时还经常碰面。只听说物理系老师对62年招收的学生评价极高，极为兴奋地说，不愁培养不出一两个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汪汪自然是人气极高的之一。

65年北大的学生被作为中央派出的四清工作队队员去农村搞社教，物理类四系被派往四川乐山专区。作为工作组成员的女队员，除了负责一个生产小队的社教运动以外，还额外负责整个大队的青年妇女运动，职责包括组织群众干部学习中央文件，发动群众揭发干部四不清行为，背对背，面对面。并对有四不清行为的干部进行启发教育，查账退赔，写上报材料，提供定性的依据。我想发动群众搞土改，不过如此，只不过一个对象是地主老财，一个对象是在职村干部，全是搞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人为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演习和前奏。我们，每一个女队员，当年天真无邪初出茅庐的20岁的女孩子，每天都在体验着夜里开完会翻山越岭独自走夜路的危险。直到一天出了大事，汪汪失踪了。几天后在河流的下游发现一具已开始腐烂的女尸，手被反绑着，脖子上套了一个装有15公斤大石头的大网袋，被沉尸河底直到尸体泡胀后，被水冲到河滩上才被发现。不管这个案件存在的诸多疑点和他杀无疑的表象，四川成都公安局给北大校方的最后结论竟然是“自杀”身亡。还居然专门解释了，她是如何将自己反绑，自己将自己沉尸河底的！

对于这样一个荒唐的结论，北大校方一直上诉和成都公安局交涉，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央指示全体北大工作队撤离四川立即返京，我们是在从四川回北京的火车上听广播播送的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再之后的事，打倒走资派，停课，停工，停产，砸烂公检法，揪军内一小撮……没人再去顾及一个女大学生的离奇死亡，更何况是一个“狗崽子”。汪汪的父亲被作为国民党的CC特务揪出，自顾不暇，更没有能力为明明冤死的女儿伸冤。但

北大的同学们并没有忘，文革中物理系同学曾自发组织了两个小分队回四川试图调查此案。每每北大年级同学聚会，汪静瑜之死是其中永久的话题和悲痛。女附中的同学们也不能忘记，难道一个曾如此鲜活的生命就被蹂躏践踏永不见天日了？

到了2014年，汪静瑜的弟弟妹妹重返眉山东坡公安局时，又出来一个从没被提起和亮相过的汪自绝于人民的关键证据“纸条遗书”。说是在死者的口袋里发现的，内容如下：

这几天我思想很乱。最近六七天，我整天想的就是如何死法。劳动也不想干，工作简直不想干。心里一点主张也没有，思想包袱重得很。我想反正工作也干不好了，我是个没用的人，没有灵魂，虽生犹死，不如死了好。

可是我又想，死了，给党的威信带来的损失，给工作带来的损失太大了，而自己死了也是不好，活着起码还可以当个劳动力，可是死了，比鸿毛还轻。人人都要骂。想死，又死不得。我就是处在这样的矛盾中。我想就这么赖着。可是又老催我交思想小结，我又交不上，因为有时我也有收获，可是不太大，又写不出来。而且，确实没多大收获，我想干脆乱写点儿交上算了。可是一想，这是欺骗党，又不能这样。

我通过这次社教，不仅没有培养阶级感情，反而更落后了，简直不知是怎么回事。看到别的同志学习毛著，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我却越走越远。我想，我回去就得挨批判，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干脆死了得了。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让我在这儿整天劳动，就算做劳动改造，我愿意留在这儿劳动，就不回去了。否则我就得不到改造。只有劳动才可以改造我，别的方法都不行。

运动开始，我也不是不想搞好，我也是努力的干，可是老做不好工作，一直到现在，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都了解的不太清楚，和他们还是讲不上两句……脆不搞工作了，整天劳动改造我，……领导老向我交任务，又要完成，又完成不好……，结果我……同志来帮我，让我搞工作，尤其是人的工作，我……因为我从小就被别人关心，……用不着操心，……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去关心别人，也……不喜欢看书，不喜欢读报，什么事都与我无关。我

一天愉愉快快的，无忧无虑，什么也不想。这次搞工作，简直搞不好，到现在……（这里是一页纸的最后一行。省略号为看不清或破损之处）

此外，他们还走访了东坡区档案局，并获得了保密局的同意，可以查阅，不得抄录和照相。卷宗是关于三位自杀者的材料，汪静瑜的材料是033页到101页。材料共有五份：1966年4月27日（书写材料，未经打印，怀疑被害）；4月29日（发现“字条”）；5月14日（已认定自杀）；5月29日（已肯定自杀）；5月30日（最后定论，其中包括打印的《眉山县委关于汪静瑜自杀的调查报告》，内容与5月29日材料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附有三个附件和开除团籍的决定）。

《决定》说汪静瑜“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站在反动立场，最终走上了自绝于革命的道路”。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材料均为文字叙述，没有任何公安部门的第一手材料，如验尸报告、刑侦报告、现场照片、死者笔迹等等的原件或复印件。

即便是在封建军阀当道的年代，一个女大学生刘和珍之死也激起过社会动荡千层浪，声讨之声不绝，鲁迅亲为她写悼文吊唁，听说段祺瑞都为此下跪忏悔。可在我们的时代，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女大学生被害，却被政府执法机构不顾各种疑点，强行罗列罪名，在没有任何司法鉴定，刑侦办案的情况下草率以自杀结论了解了此命案，至今无人敢于问责和重审。

对汪静瑜在参加眉山社教四清运动时的所谓“自杀”事件，自始至终我没有一刻相信过这个扭曲真相和掩饰罪恶的历史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荡涤，我从当年的愤怒和疑惑变为了今天的清晰：

1. 如果作为一个一心要死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她需要有多强大的心理支撑才会同时想到要如何自杀又被人看作是他杀？

2. 一个毫无心机的才华横溢的姑娘，从何时何地学会自缚自沉塘的绝技？白天还情绪

饱满地教大家唱歌，晚上便自尽了？

3. 一封太圆满地解释了他杀变自杀的证据“纸条遗书”在开始腐烂的尸体被打捞时没被发现，眉山做结论的讲话中也没被提起，十几年后却奇迹般陈列在自杀结论的关键证据中，还字迹清晰？

4. 对一个在执行公务中明显被害遇难的女大学生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内仅凭主观意识的分析就宣判了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站在反动立场，最终走上了自绝于革命的道路”。这个《决定》本身白纸黑字完全展示了一个反动血统论产物的宣判。记住这个时间段，这一切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在谭力夫反动血统论出笼之前。所以与其说反动血统论是红卫兵的产物，不如说是“阶级斗争说”的必然。在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就因为出身被全家灭门的惨案接连发生，汪静瑜因为出身不好便被定性为自杀了之的冤案便被坐实了。

如果说当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干扰了司法公正，在依法治国的当今，作为社教工作组成员的北大才女被害案，是应该被重新审理的时候了，应以法理明天下，以公正昭冤魂！

作者简介：郭娜嘉，1962-1968年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水声专业)。1968-1977年新疆。1978-1983年地质部。1983-1985年高教部公派加拿大访问学者，1986年任职中国审计署。1986-1987年中加审计项目交换学者。现定居温哥华。

【述 往】

被工宣队踢出北大之后 ——山西繁峙水泥厂琐忆

俞小平

初到繁峙

我于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满心想着苦读六年之后，进入一个学院科研院什么的，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点贡献。不幸于1966年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迎面相撞，陷入文革的疯狂漩涡。先是革别人的命，然后是革自己的命。到了1970年3月被工宣队一脚踢出北大之门，连个毕业证书都没有。工宣队总算还有点“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分配方案照顾有恋爱关系的同学。我的女友，无线电系的同学罗文迪由于至今都不清楚的好运，直接分配到山西省太原第二热电厂。我们系没有太原名额，就把我分配到山西省忻县地区了。也罢，忻县到太原只有60公里。在与相处六年多的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以后，从当时地处汉中的北大汉中分校出发，在报到证规定的五天有效期内赶到了忻县。一同去报道的北大同学有二十多人。

等了几天之后，忻县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个部队干部，召集我们宣布了分配方案。我们被两三个一组地分到下属各县，只有无线电系的两个同学有幸留在忻县，分到忻县地区无线电厂。有一对男女同学被分到偏关县，发牢骚说：“叫关就知道够远的，还是偏的！”那偏关县位于忻县地区最西北端，北边是内蒙古的准格尔旗，南边是河曲县，山高水远，周围都是山西省著名的穷县。山西民歌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我与两个同学分在繁峙县，看看地图离太原200公里，我离文迪又远了。想想分配到偏关的两个同学，想想在校分配时就被打发到四川甘孜、阿坝州的同学们，我怎么还敢抱怨呢？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分配方案明摆着这里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虽然前途未卜，身为实习生，国家23级半干部，不服从分配是不可想象的，何况前面还有那42.50元的月工资等着我呢。

同往繁峙县的两个同学，一个是物理系64级的男生，一个是西语系65级的女生李绿宁。到了繁峙报到之后，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来了一批山西本省的大学毕业生，都在一个叫做“鳌子头”的先进大队劳动锻炼，等待分配，你们也去吧。第二天，我们就

跟在载着我们行李的大车后面，沿着慢慢上升的缓坡，上了鳌子头村。我们被安排住在社员家里，与领队的县干部见面，与先来的大学生们互相介绍。我们的又一次“再教育”开始了。例行的田间劳动，例行的政治学习。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半个多月以后，我们得到通知回县分配。那个物理系的男生分在城关小学（后来很快调到城关中学教物理），李绿宁分在商业局，而我沾了技术物理系“技术”二字的光，分到县水泥厂。李绿宁到了商业局无处打发，叫她到大街上的一家商店去做售货员，北京来的大学生做售货员，当时轰动全城（县城的城墙是正方形，边长500米，居民也就是几千人）。有个老太太见了李绿宁说道：闺女，过得惯吗？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在大同和太原的实习

当时我要去的水泥厂连地址都未确定，我是第五个报到者。见到厂长，他安排我与一个本地干部去大同红旗水泥厂（大同市属企业，不是那个著名的中央企业大同水泥厂）实习。过了五一节，我和我的新同事张世和结伴去大同。厂方安排我管水泥原料和产品的化学分析及工艺配料，张世和负责水泥产品的物理试验。对于我这个化学专业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学这些当然是小菜一碟。张世和有高中毕业的底子，学水泥物理试验也不算吃力。我们两人很快就上了轨道。

四个月的实习结束后，我们回到繁峙，当时水泥厂的临时厂址就在五台山山脚下。我在大同已经对本地的水泥原料做了化学分析和工艺配比。就在我们住的小村里，砌了一个一米高的试验性立窑，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一个汽油桶大的小球磨机，用柴油机发电机供电，磨出生料，用手搓成球状，入窑煅烧。忙了一天一夜，卸出的熟料看着像那么回事。我带着熟料再去大同红旗水泥厂。我自己做的化学分析，该厂职工为我做的物理实验。结果是物理强度合格，安定性不合格。物理强度合格，说明我的配料正确。安定性不合格，说明这个小不点的立窑窑温不够高。在大同厂的工艺技术员的帮助下，我修改了配料方案。

这时水泥厂已经招收了几十个农村青年，厂领导又派我和张世和带领他们去太原市政水泥厂实习，学习立窑操作。我和张世和仍然在实验室里实习。

选址建厂

半年之后培训结束，我带着工人们回到水泥厂的新厂址。见到了县里派来的新任水泥厂党支部书记赵天青。支部书记实际上掌管本厂大权。这个新来的书记可是个能人，他是本地干部，快六十岁了，参加过抗日战争，见多识广，在本县关系众多。在实地勘察了石灰石矿点（这是水泥的主要原料）、评价了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途径后，他向县里提出：水泥厂不能建在离主要公路15里的山脚下，而而建在京原公路（北京到原平的公路）和正在施工的京原铁路旁边。因为从山脚顺坡向下运石灰石比从公路向上运输其他物资容易得多。赵天青的建议实为重要，涉及水泥厂的成败。于是厂址选在京原公路旁边的砂河镇，在繁峙县城东边三十公里。四十多年后，如今这个厂仍在那里，现在已经扩建为一个较大规模的回转窑水泥厂了。

水泥厂旁边的村子叫做常胜号，我们都借住在社员家里。最先动工的工程是生料和产品两个球磨机的混凝土基座。所有的职工都参加了混凝土基座的施工。我们从早到晚，冒着春天的风沙，每天辛苦搅拌、浇灌混凝土，所有的工作都是人工完成。半个多月的风吹日晒，大家都在风沙中晒成了酱油色。我的皮肤颜色算是最浅的，可是到了太原，没有人的脸色有我这么深。接下来的工作是建住房、车间、仓库，与我关系不大，我乘着这个功夫与文迪回南京结婚去了。繁峙人恋家恋土，不愿出门，都觉得我们离家那么远来繁峙工作不易，领导们对部下的假期也就放得较宽。婚假期间我们赖在家里长达四十天，一半在南京，一半在北京。梁园虽好，不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我与文迪在太原依依不舍地分手，回到繁峙。

在我缺席的这段日子里，厂里已经靠北边建起了一排平房，当地人称“排房”，作为

办公室、职工宿舍、伙房以及我的化验室。厂区中间规划为生产区，也在陆续兴建几个车间和仓库。厂里架了电线，打了机井，解决了供电、供水。建设立窑还要等很长时间，我们在厂区的南端，在地上挖了一个坑，用耐火砖砌了一个半球形的水泥煅烧窑，叫做“地窑”，因陋就简地开始了水泥生产。原料的工艺配比是我的工作，同时我与张世和开始筹建化验室，多次到太原购买化验室仪器设备和化学试剂。几个月后，我们的化验室正式开始工作，指导生产，检验产品。因为是用地窑煅烧，窑温控制较难，生产出的水泥标号不高，但是也是合格产品了。过去繁峙要用水泥，都要向上级申请，到大同或太原去拉货。现在本县自己能生产了，就近取货，我们的产品自然不缺销路。在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的水泥原料一直是用这种土造地窑煅烧的。同时我们也此期间完成了立窑建设，由于配套的鼓风机和成球盘等设备一直未能到货，直到我离开繁峙，也没有等到立窑开工投产，是我心中的一件憾事。由于资金缺乏，我们厂的大多数工作都靠人力完成。球磨机车间里尘雾弥漫，工人们仅靠普通棉纱口罩防尘。我看到《小水泥通讯》上的一篇文章说：“刮风就是扬灰厂，下雨才是水泥厂。”真是再确切不过了。我们厂的基建投资总共不过二十多万元，都是赵书记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防尘的旋风收尘器和布袋收尘器我们买不起，还是慢慢来吧。

繁峙的山、水、人

繁峙县地处山西北部，在太原东北方 200 公里处。北面是恒山，较为平缓，南面是五台山，雄伟陡峻。北、东、南三面为山势环绕。交通是从同蒲铁路的原平来比较方便。我在那里之前已建有沥青铺面的京原公路，我在那里时修通了京原铁路，从原平越过代县就到达繁峙县境。在恒山和五台山之间是一片平川地，向东北方向越走越高，在东端被山岭封闭，其间的通道就是著名的平型关。华北的大河滹沱河从此发源，向西南流淌，过了原平才掉头向东流入河北省。滹沱河流过砂河附近时渗入地下形成暗流，在地下潜行三十里

后又流出地面。平常河床里滴水皆无，附近的砂河桥形同虚设，可是当上游山洪爆发时，洪水轰鸣着汹涌而下，几乎要没过桥面。按气候论，繁峙县已是高寒地区。我初到那里时，1970年9月30日下了入冬第一场雪，而1971年5月1日下了开春最后一场雪。冬季气温常低达零下20多度。本地人以火炕、狗皮褥子和羊皮大衣御寒。南面的五台山如一道屏障耸立，出山的唯一通路是从砂河镇通往五台的砂五公路。都说五台山里有巨大的国防战备基地。水泥厂座落在京原公路和砂五公路的路口，我经常看到长串的军车开进开出，尤以夜间为多。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道场之一，山顶上有数十座寺院，离我的住处不过数十公里。由于心情不佳，从来没想着上去过。南面的恒山山势和缓得多，我曾多次乘长途汽车来往于砂河和大同之间，见到过著名的悬空寺和应县木塔，也就是路过而已。

繁峙县富有铁矿，当年就有一个国营铁矿在开采。砂河南北两面的山里都有铁矿，因为品位低未能大规模开采。在北面山上义兴寨有金矿，当年也因为探明储量少品位低未能开采，但是在改革开放后，那里已经开发为山西最大的金矿。北面的五台山区有大片国有森林。林区出产的五台山蘑菇，简称“台蘑”，其口味不亚于著名的张家口“口蘑”，是我探亲假带给父母的难得的美味。繁峙县县办工业少得可怜，除了已有的农机厂，两个小铁矿，就是我们这个在建的水泥厂了。其他几个小厂也在陆续筹建，始终动静不大。繁峙县不产煤，好在山西到处都有煤矿，煤炭供应不是问题。虽然繁峙是高寒地区，冬季严寒，由于煤炭供应充足，我倒没有挨过冻。

繁峙县“民风淳朴”，我这么说未免老调常谈了，但是这是实话。农民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天高皇帝远，说话做事都很实诚。我们厂的工人都是本地招来的，挣这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是走后门搞关系抢着来做的。即便这样的低薪，比在村里当社员修理地球要好得多。当地农民把干活叫做“受苦”，自称“受苦人”。一天下来干完了活，就说“受下了”。水泥厂的工人，有几个都四十多岁了也没结婚，讨不起老婆。有的就去搞人家的老婆，时不时给女方点钱物，帮着补贴家用，当地叫做“拉边套”，都是公开的秘密，多半发生在男人无力养家的家庭。当家男人也就是睁一眼闭一眼，形成实际上的一妻多夫。

农村里文化生活极其贫乏，仅有的新闻来自广播喇叭。偶尔砂河镇来了电影放映队，周围村落的农民都来观看，那架势就如同过节了。有一回放的是《红色娘子军》，小青年们第一次看到女人穿短裤。每当女战士们大腿踢起，看电影的小青年们就要齐声吆喝一声“吆！”

我在水泥厂的日子

刚刚到达水泥厂筹建地时，白天忙着干活，也就罢了，夜间我一人坐在土炕上，就着煤油灯读书打发时间。夜间四下里万籁俱静，除了偶然的几声狗吠，能听到的只有自己耳中的本底噪音，在无声的环境中仿佛无限地放大了。父母远在一千公里以外，同学们已经星流四散，文迪在 200 公里以外。我要在这里过一辈子吗？“臭老九”的前途在哪里？

待到 1972 年 3 月，我们的女儿在南京出生。我们夫妻两地分居，没有能力带她，只能把她留在我的父母家里了。女儿出生 18 天我就离开她返回繁峙。两个月后，文迪也流着泪离开了万般不舍的婴儿回到太原。女儿的户口也随母落在了她从来没去过的太原。我隔几个月就找机会去太原出差，那就是我们夫妻团聚的日子。

我是吃“公家粮”的干部，每月三十多斤粮食定量。与过去在南京、北京不同的是，繁峙的粮食定量有它特殊的比例：高粱面、玉米面、白面、小米、黄米面和莜面，一共有六种之多。高粱是杂交高粱，比例高达 41%。我要是自己开伙，就得每月拿六个粮袋去买这六种粮食，总共不过三十多斤。食油每月 3 两，肉类没有稳定供应。我在水泥厂的食堂搭伙，把粮本交给食堂大师傅，免了我提六个口袋去买粮了。杂交高粱产量高（其实这个产量高在繁峙也是假的，繁峙无霜期短，杂交高粱没成熟就受冻，产量反而很低，上面指令种植，不敢不种），但是消化吸收率很低，因为含有单宁，口感很差，吃在嘴里如同嚼泥，做饲料猪都不爱吃。凡有可能，我总是跟大师傅商量，给我玉米面贴饼子代替高粱面饸饹。蔬菜常吃的是大白菜炖土豆，一大锅煮熟了，上面浇半勺在火上炼熟的豆油，这就是全厂一百多号人的午餐菜了。这样的饮食营养显然不够。每年我回南京、北京探亲，勒

在肩上的两个旅行袋里装满了吃的：大米、挂面、香肠、香肚、酱油膏等等，在以后的一年里细水长流地补贴我的伙食。在村子里可以向农民买到鸡蛋，偶尔黑市上有高价猪肉。时不时地与厂里的职工们一起聚餐，锅里煮的是大白菜、土豆和黑市上的猪肉，再来一瓶白酒，当地叫做“打平伙”，解解馋瘾。说起来有点恶心：黑市上的猪是吃人的粪便长大的，这样的猪肉公家是不会收购的。即便有些额外补贴，我在繁峙的时候营养状态仍然很差。太原是省会大城市，物资供应比繁峙好得多。每次到太原去与文迪团聚，总要在她那里吃上一星期，干枯的脸上才会有些光泽。1972年繁峙大旱，粮食收成只有常年的一半。刚刚入冬，农民就有要出外逃荒的迹象，上级立刻调粮来救灾。这对我们吃公粮的倒是一件好事：调入的粮食是大部分是玉米，免了我吃那41%的杂交高粱面。

水泥厂虽然是个工厂，周围都是农村农田，厂里的工人也都是农家子弟，所以我是完全待在一个农村的环境里。农村的好处是很少讲政治，除了必须宣读的报纸、文件，当地人很少谈论政治，最多的议题还是生活，张家长李家短的。山西农民虽然贫穷，却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有着天然的尊重。我到繁峙时24岁，在厂里，除了支部书记赵天青、厂长和副厂长三个人管我叫“小俞”，其他所有的人，无论年龄大小，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都叫我“老俞”。称呼人以“老”字开头是一种尊重，人家敬重我，我也不能让人失望，老就老吧。

所有的水泥厂的职工，除了我一人，都是繁峙人。赵书记实际上是全厂大拿，所有大小事务都是他说了算。他也是个很聪明有经验有智慧的人，虽然独裁，决策却没出过错。没有他的强势领导，水泥厂不会那么快就投产。赵书记有肺气肿的毛病，身体不好，县里把这份工作交给他，也是因为繁峙一个穷县办厂不易，要依仗他的能力，他确实尽了全力做好它。厂里几个干部开会讨论工作，他说到兴头上，当众把背心脱下来挠痒捉虱子。好在都是男人，没有性骚扰问题。关于虱子，繁峙人的说法是：虱子是肉里长大，从毛孔里钻出来的。大凡能人都有脾气，赵书记脾气也不小，职工们包括干部，没人敢在他面前炸刺儿。他对我十分尊重，从来不对我发脾气，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总是用商量的态度与我

谈话。赵书记如此待我，全厂自然没人跟我过不去。尊重读书人，是农民千年来的传统。

通往北京之路

我一个人单身在繁峙工作，文迪在太原，女儿在南京。我们一家只有在去南京探亲时才能团聚，一年一次。每隔两、三个月，我的妹妹就寄一批照片给文迪，聊以安慰她的念女之心。

女儿的出生是一个好兆头。当她才出生后，我的岳母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北京京郊正在扩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需要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当时抽调兰州、吉林、大连等老石油化工企业的职工仍不足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领导们把头脑动到了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胡乱分配的老五届大学生的头上。总厂的方案上报燃料化学工业部批准后，国务院下令北京市给总厂500个户口名额，总厂就撒开网在全国各地捞人了。我的岳母得到这个消息，托人为我和文迪提出申请，几经周折，申请终于被批准。

那时一个人倘若想要调动工作，首先要本单位肯放人走，然后才谈得上有单位肯接收。我在繁峙县上上下下跑了多次，终于得到本厂领导的首肯，然后又得到县工业局的放行，县领导的批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各级领导虽然不太想让我调离，可也没有过于留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晋北地区山地纵横，交通不便，本地人大都觉得热土难舍，不愿离乡。我这样的外地人到他们那里工作，本地人都觉得不易。将心比心，对我也就不为己甚了。

心忆繁峙

我离开了繁峙。在以后的几年里老是在想着，我应该离开繁峙吗？从小学到大学我受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待在哪里。到北京去，到全中国物质条件最好、文明程度最高的首都，是大家都向往的事。可是繁峙呢？繁峙县水泥厂呢？那个贫穷落后的山区县份，不是也需要我吗？

可是我愿意永远待在那里，吃那 41%的杂交高粱和每月三两的豆油吗？我愿意我的妻子和女儿跟我来做繁峙人，在繁峙待一辈子吗？我的脚已经走出了繁峙，我的思想仍然在两难中徘徊。后来读了一些网上的论文，论及这样的情况是典型的双重人格的困惑。我们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或多或少都具有双重人格，否则很难在那样的社会生存下来。■

写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

【述往】

难忘 1969

郑世忠

1969 年，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武斗基本上结束了，互相对立的派别也实现了“大联合”，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可谓形势一片大好。这一年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一年，也是全国人民更黑暗的一年，擅长搞群众运动的伟大领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运动群众。”

自 1968 年提出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之后，全国各地的艰苦地区建立了不少“五七干校”，这些干校实际上就是监督管教知识分子的劳改所。到了 69 年，更大量的文教界、科研界、艺术界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各地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我的朋友老林就是在这年被遣送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的。老林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在老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心理所还能研究什么，还敢研究什么！濒临解散的心理所只好连锅端到了“五七干校”。在干校里，生活是军事化的，即使是夫妻也不能同居，学员们随时都有被隔离审查的可能，人的尊严丧失殆尽。这一年，北大也有很多教工去了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据说那个地方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技术物理系林璇英老师的丈夫就

死在了鲤鱼洲。噩耗传来的时候林老师已经有了七、八个月的身孕，但依然带着大肚子参加师生的学习讨论会，她那瘦弱、苍白、愁苦的面容至今难忘。

1969年，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多的一年。老毛利用这些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帮助自己干掉了政敌后，开始不喜欢这些曾经叱咤风云，而今又桀骜不驯的红卫兵小将了。于是，一车又一车的中学生被运往山西、陕西、内蒙、黑龙江乃至西双版纳等地当农民，不管你是根红苗正的革命造反派，还是黑五类资产阶级狗崽子，统统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昔日的红卫兵风光不再，要靠挣工分吃饭了，他们承受着肉体上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摧毁了本应有着花样年华的一代青年。虽然，在78年落实政策之后大部分知青都已陆续回城，但这段经历在他们心中刻下的印迹是永远磨不掉的，以至每一个知青都能讲出一段辛酸的往事。如今，这一代人的年龄都已经在五十多岁了，他们成了中国特有的一个群体——知青族。

就在这一年的三月，珍宝岛的战斗打响了。我们无须考证是谁打响了第一枪，似乎一场蓄谋已久的大战即将来临。古今中外，独裁者都喜欢战争，乃至穷兵黩武，“与人斗，其乐无穷”嘛！于是，全国一片车辚辚、马萧萧的备战场面，摆出一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的架势。民兵加强实战训练，一列列的军车运载着子弟兵向边境集结，风萧萧兮，壮士去兮。不知壮士，战为何兮。与此同时，大批的内地工人、技术人员开赴“三线”，使本来已经十分薄弱的国民经济愈加萧条，即使如此，统治者仍然继续让百姓勒紧裤带，并美其名曰：“备战、备荒、为人民”。按当时老百姓的话说，这真是“又穷，又硬，又不要脸。”

这一年，北大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和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的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发配到陕西汉中。69年初，北大仍在进行着惨无人道的“清理阶级队伍”，就连程汉良、刘立民也当上了反革命。高校中北来自杀的人数可能是最多的，可以说，68年底至69年初的这几个月是北大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

4月份，8341部队进驻北大，接替了在“清理阶级队伍”动中犯扩大化错误的63军。

然而，春天并没有随“8341”部队而来。

经过三年磨炼而更加成熟的同学们清醒地认识到，63军和“8341”都是老毛的打手，只不过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而已，北大依旧是严冬。同学们对于没完没了的学习、讨论、批判已经厌烦到了极点，心中充满了难以排遣的哀怨，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毕业。这一年，我们已成了最高年级，系里66至68届的学生均已在68年底前分配了（郭青苔也随之分到陕西乾县羊毛湾水库），据说，“胡子兵要半业”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上。

我是62年考入北大我的家境很贫寒，上学的费用全靠工资不高的哥嫂供给。我几乎每年都申请助学金但从未被批准过，原因是我有经济来源（指哥哥）我并不是在责怪当时的干部，因为他们的思想境界都很高，在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他们也是在尽力地为国家节约每一个铜板。本来，我们63级的学生即使按正常的六年学制也应该在69年毕业分配。我实在不忍心继续拿着哥嫂的钱瞎胡混了，眼巴巴地盼望着毕业分配的这一天。然而，毕业被无限期地推迟了，因为是“六厂二校”，所以要留校“继续闹革命”。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这个不通人情的决定让再度失望的同学们欲哭无泪。

这一年的10月，我的好友老林离开北京去了“五七干校”。老林是我的高中同学，在我大学期间他经常在物质上支持我，文革时他在心理上当了一阵“反革命”，后来成了逍遥派。他经常到北大找我老罗、老梁、晓地、老何等同学都认识他。老林走的那一天我很难过在北京站送别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整个站台上是一片感天动地的哭声，有的抱头痛哭，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晕倒在地，有的失去常态。老林在车窗内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站台上哭泣的妻子，没有语言，只有热泪。火车动了，哭声撕心裂肺。这哪里是送行，简直是生离死别！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铁石心肠的人也要落泪，甚至连军代表也躲了起来。这哭声是心中积怨的大发泄，是对“五七道路”的否定，是对独裁统治的示威！

这一年，北京站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这样的场面。据说，送别知青的情景更凄惨，只要去过一次，就不忍心再去第二次。我的老伴儿是知青，她至今不愿提起当年家人送她上火

车时那悲伤的往事。在送走老林之后仅仅个星期，我们就被告知，技陕西汉中 653 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和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要全部迁往汉中，这在精神已经十分沮丧的同学中引起一片哗然。特别是几个家在北京的同学更是焦躁不安，其中老 MON TUE WED THU FRI SATI SUN 罗是最伤感的一个，因为在这些人中老罗最恋家。

我的家在郊区昌平，在去汉中前，即使是惜时如金的上课时期，也保证每个月回一次家看看父母。这次去汉中，也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远离北京（大串联除外）。到汉中以后又怎样？前途更加渺茫，但可以肯定，是不会有有什么好果子吃的。天大地大，不如爹娘的恩情大。在上路之前，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家再看一看年迈的父母。经过一番努力，工宣队终于准假了，但只能晚上回去，早晨必须赶回。临出家门时老父亲说的话至今言犹在耳，“走吧，到那儿常来信，别惦记家。”充满了无奈，也带着安慰。在回校途中的火车上我的头始终朝向窗外，任凭眼泪不住地流着。

10月下旬，两个半系的师生员工以及医院、后勤、食堂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带着无限的烦恼与忧伤被塞进了由北京开往陕西阳平关的火车。到了阳平关，又由汽车经几个小时的连夜转运，最后卸在了汉中的北大 653 分校。在这里，我们度过了大时期的最后四个月，也是决定命运的四个月。70年的2月底，终于盼来了毕业分配，然而等待我们的是更残酷的现实。■

【述往】

武斗惊魂

左伯莉

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分成两大派：新北大公社和新北大井冈山团，我参加了井冈山。从1968年3月29日凌晨开始，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校园内，发生了历时四个月的大规模武

斗。武斗期间，我经历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

武斗时井冈山的总部设在28楼，我们班几个井冈山的女生都住在28楼，有余良云、赵秀琴、周振琦等。女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做饭，记得张铁壁帮厨做了一道炒腰花，因为他处理腰子时，腰臊去除不完全，炒完后，味儿满全楼，成了大家的笑柄。大家也没舍得扔掉，竟然闭着眼睛吃了下去，毕竟也是肉吗。我因为家离的近，时来时去，没有一直住在那儿。

我上大学时胆子特别大，曾经爬上北大老图书馆后面的桑树去摘桑葚，那树可有三层楼那么高。上大学时学校组织过横渡昆明湖，我不管自己的体力和本事，也报名参加了。结果游到一半时，就游不动了，幸亏在旁边游的陶令煌拉了拉我，并鼓励我，让我调整呼吸才没出事。我跟别人吵架时，曾端起一盆水把对方从头淋到脚。我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但武斗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真正感到害怕了。

28楼是工字楼，楼顶是一个大平台。武斗时，为了便于晚上观察对方，双方都在楼顶上安置了探照灯。探照灯是绑在一张四方桌子的腿上，再把桌子架高，便于开关和转向。当时所用的武器是用自行车的内胎做的大弹弓，将皮条绑在木凳的两条腿上，拉弹弓时要用脚蹬地使上劲，皮条才能拉长。弹弓的威力很大，打出去的子弹般用的是小半块砖头。

记得一个夏天的夜晚，外面漆黑漆黑的，我突然心血来潮，鬼使神差地想到楼顶去看看武斗的夜景，就戴了个柳条帽，和谁也没说，爬到了楼顶。看见探照灯，就走过去，把灯给打开了。突然，只听见咚的一声巨响，再一看，我头顶上的桌子被打了个盆大的洞，要是我的头再高一点，半个脑袋就削掉了，小命就完了。我顿时吓坏了，扭身就往回走，这时楼顶上已是多弹齐发，砖头四溅，尽管我腿脚灵活紧躲慢躲，小腿还是被溅起来的砖头击中，留下了一个终身的疤痕。

受了这次惊吓，第二天清早我就离开了28楼，再也没回去过。■

【述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四）

——逝者血泪·孙泱之死

陆伟国



孙泱，生于1913年，四川南溪人，早年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肄业，1938年入党，长期在部队工作。解放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1964年4月，为加强人民大学的领导班子，配合新调来的郭影秋的工作，由中共中央任命为人大党委副书记。

极左势力为什么要盯上孙泱呢？孙（年轻时的孙泱）泱的引人注意，不只是他的个人经历，更在于他非同一般的身世。他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他父亲孙炳文与朱德是好友，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1922年两人同去法国，11月就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两人一起入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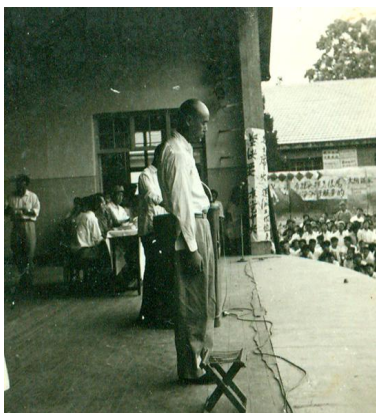
孙炳文是中共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携妻儿从广州坐船北上，准备去武汉就任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结果刚到上海港下船时即被捕，20日牺牲于上海龙华。当时，孙泱14岁，女儿孙维世才5岁。此后，朱德对孙炳文家人关心甚多。孙泱也就长期任其秘书。后来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



（孙泱的父亲孙炳文）

但是到了文革，这份光荣历史却带来了巨大麻烦。极左势力很早就盯上了孙泱。1966年6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那次会上，康生找到已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谈话。康生问：“孙泱这个人怎么样？”郭影秋回答：“他还不错，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后代，做过朱老总的秘书，政治思想表现和工

作能力都可以”。但康生却沉着脸说：“是这样吗？！”稍后又说：“这个人很坏，不能说做过朱老总的秘书就一定可信，你要注意。”



果然，孙决是人民大学领导干部里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人民大学对当权派的第一场大批判会，是在6月13日，工作组进校的前一天。那天上午9点，学校依据上面的要求宣布，孙决停止领导职务。10点，孙决等人就在文化广场上被批斗。这次还只是叫几位领导站在台上，垂手而立，接受批判，还没有怎么动手动脚，但这已经是很惊人的了。

（文化广场首次批斗孙决大会）因为是第一次看到领导会被这样对待，站在下面参加大会的我，感到很突然、很惊讶，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啦？

1966年10月之后，文革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左势力的矛头更加明显，其打击目标也包括了要打倒朱德。他们采用的战术是首先点名批判孙决编写的《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决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这是张春桥出的点子。张春桥大骂《朱德传》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11月对孙决的斗争开始升级。可是，孙决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写书是尊重历史事实的。

在反对朱德、反对孙决的浪潮中，戚本禹充当了急先锋。1967年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召见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看到红卫兵有所不解，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有人问：“怎么个批法？”戚本禹说：“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决吗？他给朱

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

需要说明的是，这天晚上，戚本禹对人大的两派组织都召见了，而且双方是一同去的。但戚先对“新人大”谈，“新人大”的人也就先打电话回学校。等“三红”这边回到学校，“新人大”就已经抢先把孙泱抓走关了起来。直到孙泱被害死，一直被关在“新人大”那一边。

不久之后，戚本禹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他在大会上，对孙泱的问题，讲的很具体，也很明确。他说：“孙泱是几号（被罢的官）？（会场呼应：六月十三号）六月十三号，孙泱六月十三号的罢官是个大阴谋。孙泱是个什么人物？是蓝衣社的特务，钻到共产党内部里边来，为陆定一黑帮严慰冰反革命分子有密切的联系。长期给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服务的。在这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你们革命的，这样一个人。你们现在看，你们进行什么斗争？进行的斗争，水平高不高？（不高）他们居然对你们的战斗队十分猖狂，说他有权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没资格问他的问题，为什么他敢说这样的话？所以说你们没打倒孙泱，孙泱敢于同你们那样嚣张，敢于跟你们说，‘你们没有资格弄清这个问题’。‘我有权力不回答你们这个问题’。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对他有了解。是的，我们对他是有了了解的，我们了解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最后他说：“人民大学的问题变成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最复杂的问题。什么道理？就是没有掌握这个对敌斗争大方向。”在戚本禹的煽动和指令之下，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迫害，就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典型的就是6月8日和6月13日，连续大会批斗孙泱。

但事不遂愿，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在政治上就先跛脚了。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极左势力想想，还是枪杆子比笔杆子重要。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先后被甩了出来。戚本禹就再没有话语权了。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决。戚本禹不行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1967年9月6日，康生点名孙决是“大特务”，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特务多。同月26日，陈伯达、江青两人也迫不及待地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的大会上再次讲这个话。那次会上，陈伯达说，

（1967年，对孙决的批斗大会）孙决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决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是蓝衣社特务。

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象腔。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象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而且，这些极左势力的头面人物，不但语调怪异，实际上性格行为和心理都是反常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这些人物的心理反常而导致行为、语言的反常，并进一步导致运动和整个社会进程的反常。

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决的迫害陡然升级。孙决除了大会批斗，还被连续审讯和毒打，打得很厉害，受到严重内伤。郭影秋在他的“临终口述”中讲到：“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决、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决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

没几天，10月6日，孙决就被害死在被“新人大”关押的图书馆地下室里。据说，当时有个“上吊自杀”的现场。因为关押他的地下室内没有任何可供自杀的工具，他就

把床单拧成一条，捆在暖气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气管道很矮，所以只能使劲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将自己的一条命勒死。更有可能的是遭受毒打伤重而死。有句话说，文革中的自杀，其实都是他杀。尸体解剖还发现他腹内空无一物，这之前还不知经受了多少的饥饿。不知道后来工宣队进驻后对此事进行调查的正式结论是什么。

按说，那时对关押“走资派”的看管是很严密的。比如“三红”这边对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副校长的关押，就是每天都有两个女同学24小时连续看管。尽管李在1965年初已经离校去邮电部任监察组长。我们班的两个“三红”女同学就去看管过一天。不知他们那边怎么会出这个问题。但是，孙泱像他父亲一样，表现刚强，至死不屈，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孙泱被关押和遇难后，他的夫人、相貌和风度都非常出众的石琦也被关押，而且遭受到了灭绝人性的迫害和蹂躏。他们孩子的成长道路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是在重重磨难之后，经过努力和奋斗，都有了很好的成绩和生活。

朱德在得知孙泱的死讯后十分悲痛，说：“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误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孙泱遇难前，朱德曾几次想请周恩来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说：“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些。我保了他，日子更难过了。”

（《劫世红格格孙维世四十年祭》，圆月弯刀，新浪博客，2010年10月13日）

朱老总自己的境况，也是一言难尽。远的不说，文革一开始，在1966年5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受到了林彪等人的围攻。在这次会上林彪指着朱德说：“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他是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也没做过总司令。”（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朱老总的逝世，更觉蹊跷。2011年11月20日，年过八旬的朱德的儿媳赵力平在北京玉泉路国防大学对面公寓接受采访时，证实了朱德被“意外”感冒的情节。1976

年6月21日，已是九十高龄的朱德被安排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却在空调房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出现了感冒症状。进医院治疗几天后，一直未见好转。家属中有懂医疗的，当时还特地向医疗组提出，“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但医疗组却拒绝换药。朱德就这样在“意外”感冒十余天后不治身亡。（周海滨：《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见《同舟共进》）而朱德夫人康克清则进一步回忆道：1976年6月26日，朱老总住进医院。“当时天气很热，老总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样，我就紧张起来，老总的病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我说什么也不相信，他各方面看来都很正常。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朱老总从住院到逝世，只有十天……他走得如此匆忙，他自己怕也毫无思想准备。”（《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杨胜群、陈晋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离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这之前，周恩来于那年1月8日逝世。这三个主要领导人恰巧都在同一年里相继离世，而且前后相差仅八个月。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提出过。

【考证】

“新北大公社”打压“井冈山兵团”的“干钧棒”

——《新北大》关于“红旗飘、牛辉林”的评论（下）

樊能廷

1967年12月20日《新北大》144期第四版，新北大公社新北大、红色清道夫、红梅、起风雷、扫雷、岿然不动、顶风船、文二（四）一支队、0763支队、钟山风雨、07东方红、第二刺刀见红《北大井冈山是极右势力和极“左”思潮的混合物》说：

北大井冈山兵团是北大极右势力和极“左”思潮相结合的怪胎，这个怪胎是关、王、

林反党集团的蕴育下堕地的。这个兵团的决策人戈华、周培源、孔繁、杨克明、牛辉林、俞启义之流代表了北大的极右势力（有些本身就是极右分子）。而以 0363 北京公社为代表的原团、O派广大战士则是北大的一支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的，造反队伍内部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派别。但是，他们早已被绑在周培源、牛辉林之流的战车上，成为极右势力在北大复辟资本主义的打手和工具了。这就决定了井冈山兵团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必然对外投靠关、王、林反党集团，对内打击革命左派，纵容老保翻天，必然充当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在北大复辟资本主义的保皇角色。

1968年1月7日《新北大》147期第三版，原井冈山5.1纵队房志民《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说：

兵团总部一些坏头头与潘梓年、吴传启反党集团打得火热，自从七月份牛辉林等人以“红旗飘”多思战斗队名义炮制的大毒草《三十五个为什么》出笼后，社会上引起很大混乱，把聶元梓同志打成黑手，大搞特搞，转移视线，掩护了真正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黑手——林杰反党集团。

1968年1月18日《新北大》149期第版，原井冈山兵团07纵队战士林世治《是造反的时候了》说：

井冈山兵团少数决策人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中央文革指出，孔繁、杨克明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人物，井冈山兵团少数决策人却要给孔杨翻什么“沉冤案”，把自己放在和中央文革对立的地位上。江青同志在去年九月份就指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时至今日，坏人还未揪出，兵团决策人也不发动群众去揪。

1968年1月22日《新北大》150期第一版，社论《打倒派性，揪出坏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说：

井冈山中广大革命同志已经认识到兵团的大方向错了。他们造总部决策人的反，不接受他们的领导，要揪出“红旗飘”里的坏人，从根本上扭转井冈山的大方向，按中央文革和市革委会的指示办事，承认并支持校文革；很多人干脆造反下“山”，加入新北大公社。

我们为他们的革命行动叫好！我们深信，在井冈山广大革命同志的努力下，红旗飘里的坏人一定会被揪出，井冈山的大方向一定会根本扭转，新北大革命的大联合一定能实现。

处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井冈山中的坏头头，为了维护其小山头，狂热地继续不断地煽动派性，破坏革命大联合。因为他们明白，一旦派性被打倒，他们“二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夺权阴谋就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在也无藏身之处。因此每当大联合出现新气象时，他们就制造谣言，无事生非，甚至不惜挑起武斗，蓄意增加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这是孔牛侯们的阴谋，我们必须戳穿！目前，井冈山兵团中有的同志气呼呼地说：“我大方向就是错了，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些同志就是染上了派性的毒菌，中了牛辉林之流的奸计。

第二版，新北大公社德章《警惕坏人利用派性保护自己》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我们一定要遵循这一最新最高指示，要让井冈山中的革命战士自己揪出“红旗飘”里的坏人。尽管红旗飘中的坏人，北大的乌龟王八现在暂时还能蒙蔽一些群众，煽动派性，制造武斗，然而，他们的蒙蔽是不会长久的，他们终究是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

同期第三版，《简明新闻》：

新北大公社战士和校文革保卫组，在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保卫组的协助下，经过长期调查，终于揪出了北大井冈山兵团“五·七”文科班坏头头、“红旗飘”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谢世扬。谢犯疯狂攻击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大恶极，于一月十七日被我新北大公社战士批斗后依法逮捕。【笔者注：在北大“文革”期间，“校文革保卫组”通称“二组”，头头是“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谢甲林。经他批示，向公安部门“报送材料”抓捕过谢世扬等几十个人。“井冈山兵团”无权无势无依傍，没有向公安部门“报送材料”抓过任何人】

1968年1月27日，《新北大》151期第一版，社论《以大联合实际行动掀起拥军新高潮》说：

尽管井冈山少数坏头头牛辉林之流至今仍然千方百计煽动派性，挑动武斗，制造事端，

抵制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他们的阴谋是决计不能得逞的。

第一版，红一团小学生航空兵文章《革命战斗友谊万古长存》说：

我们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了陶、王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孔、杨和牛辉林之流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镇压了一小撮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小丑。

关王林反党集团、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牛辉林之流对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解放军恨之入骨。他们恶毒攻击驻校解放军“支保不支左”。

同期第三版，东语系文革政工组《我们是怎样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说：

赵金林同志生动地讲述他如何被坏头头牛辉林之流蒙蔽上了“山”，又如何同学们在热情帮助下，认清了北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毅然决然造反下了“山”。公社战士检查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派性——红九团发表“打倒季羨林”的声明后，介绍季羨林罪行时，不让井冈山九纵战士进去听。

1968年2月22日《新北大》155期第一版，本刊评论员《校文革就是无产阶级红色政权》说：

江青同志又一次支持了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她说：“上次开会我批评了她（指聶元梓同志）一下，我给她指出缺点。对聶元梓同志正象对待在座的同志一样。对她的成绩是肯定的，对于她的缺点是批评的。聶元梓同志在文化革命中、开始有两件大事我是记得很清楚的。第一件就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她是其中之一；另外她揭发安子文反党集团是好的。但聶元梓就背上这两个包袱喘不过气来了；是不是？”并严肃指出：“上次那个叫红旗飘的，他的讲话就不是那么高明，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群众是好的。牛辉林到处抢，到处抄，是有人授命给她的。”

同期第三版，井冈山兵团第一刺刀见红战联队、红色风暴《为革命大联合大喊大叫》说：

江青同志说：“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由于兵团少数决策人的极力阻挠，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红旗飘”里的坏人至今还未揪出。

1968年3月7日《新北大》157、158期合刊第一版，红学兵《领导班子就是政权》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且正在夺取全面胜利。以陆平保皇党和“红旗飘”里的坏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正在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他们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要砸烂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校文革。

去年八月，井冈山兵团的少数决策人，适应关王戚穆林反党集团的需要，将五方拼凑成为井冈山兵团以后，这种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是变本加厉了。井冈山兵团的决策人和红旗飘里的坏人，秉承关王戚穆林反党集团的旨意，提出了一条明确的夺权纲领：“一切权力归井冈山”。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挥下英勇战斗的；它代表了新北大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利益，而绝不代表陆平保皇党和红旗飘里的坏人一丝一毫利益。

1968年3月26日《新北大》161期第四版，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常委会《关于孙蓬一同志问题的严正声明》说：

陆平保皇党、“红旗飘”里的坏人和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一小撮坏头头为了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配合校内外的右倾翻案黑风，颠覆新北大红色政权，以他们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孙蓬一同志进行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并于3月22日凌晨闯入孙蓬一同志家中，进行了野蛮的打、砸、抢、抄。事后还印发了所谓“通缉令”，妄图实现一举把孙蓬一同志置于死地的狼子野心。

必须严正指出：陆平保皇党、“红旗飘”里的坏人这群小爬虫对孙蓬一同志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是个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转移目标、掩护他们的黑后台过关的大阴谋，这是阶级敌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严重步骤，这是北大又一次“老保翻天”的信号。

打倒北大井冈山黑后台！

坚决揪出“红旗飘”里的坏人！

1968年3月30日《新北大》增刊第二版，新北大公社无限风光在险峰战斗队《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笔者注：四千余字】说：

三月二十八日，牛辉林之流在28楼召开了一天纵队长会，会上总部头头侯汉清挥动拳头说：“一定要在今天十二点半钟动手拿下31楼、40楼。”总部的另一个头头靳枫毅还授意03纵队说：“31楼我们人多，攻31楼有把握。”方案既定，立即行动。他们把“武斗纵队”——16纵首先调进31楼，并带有铁棍等凶器。晚八点一刻，井冈山兵团5.1纵队开始攻40楼，八点二十分开始赶住在40楼的新北大公社战士。晚十二点半，在16楼的房上打出了七发白色的信号弹，牛辉林之流开始对住在31楼的我新北大公社战士下毒手了。但一贯靠造谣、栽赃过日子的牛辉林之流却恶人先告状，反诬我们要占31楼。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新北大公社战士被迫开始还击。大约二点多钟，牛辉林之流的外援部队来了，从南校门开进了100多人，手持凶器，同时控制了西校门。当夜××东方红“医疗队”就来到了北大。

二十九日清晨七点左右，聶元梓同志和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到30楼武斗现场制止武斗。这时，井冈山兵团一小撮阶级复仇分子手持匕首行刺聶元梓同志，解放军挺身而出保护，手被刺伤，聶元梓同志的头部后方被刺受重伤，顿时血流满肩。在聶元梓被刺伤的同时，李副司令员也被打伤。这是一件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凶杀案，这是对市革委会和卫戍区的猖狂挑衅，我们最最强烈抗议牛辉林之流的反革命暴行，并勒令你们立即交出反革命杀人凶手！

1968年4月8日《新北大》164期第三版，新北大公社红一团《反革命小爬虫傅崇碧是怎样把黑手伸进北大的》说：

就是这个反革命小丑傅崇碧，一手包庇了陆平保皇党和“红旗飘”里的坏人抄砸新北大专政机构——校文革保卫组的反革命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这个反革命事件发生后，我们敬爱的陈伯达同志，当面责令傅崇碧处理这一事件。可是傅崇碧这个混蛋对抗伯达同志指示，拒不处理，继续纵容孔杨牛

侯之流更加疯狂地反对新北大红色政权，真是猖狂已极！

同期第四版，新北大公社钢一连、工程兵部队《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设在北大的桥头堡，坚决揪出井冈山兵团中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四回合的决战时，刘邓的黑爪牙王关戚为了他们的反革命战略需要，花了很大的力气，一定要在北大设立一个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的桥头堡，一定要拉起一支听他们指挥，为他们服务，并能与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抗的队伍来。于是，在这个反党集团的积极策划下，老井红中的反动骨干，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小丑，被江青同志点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和北大深池中的乌龟、王八、叛徒、特务、美国兵、国民党支部、反动权威、三反分子、走资派，带着强烈的阶级复仇情绪，结成了以红旗飘里的坏人为核心的反动小集团。这个反动小集团按照王关戚反党集团的旨意，蒙蔽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拼凑了今天被这个反动小集团牢牢控制的保守组织井冈山兵团。

1968年4月15日《新北大》166期第二版，有的同志《毛主席的话说到咱心里》说：

想起过去的苦，想起毛主席给我们的甜，我要跟刘邓陶、跟陆平黑帮、跟牛辉○【笔者注：报纸原文如此】之流斗争到底！

“井冈山兵团”有一批专门武斗的打手，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是雇佣军。那些黑帮特务有的是钱，拿出钱来给“井冈山”，“井冈山”不少人就是为了自己而被反动小集团利用的，他们是为黑帮、国民党卖命。比如三月二十九日“井冈山”挑动武斗，他们吃的是面包饼干。我们按照江青同志指示起来武卫，吃的是凉窝窝头，我们的窝窝头比他们的面包硬，我们的人过得硬嘛！

【笔者注：聶元梓、孙蓬一发动北大3·29武斗事件，笔者也是在睡梦中惊醒，随同好几百人被“新北大公社”工人为主体的长矛队从31斋赶出楼，没有面包饼干，也没凉窝窝头，只有饱尝长矛、铁棒、石灰包和户外的寒风。】

1968年4月18日《新北大》167期第三版，新北大公社革命工人兵团、红旗兵团《你

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评井冈山兵团的反动政治纲领》说：

江青同志指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可是井冈山兵团中的这伙反革命小丑，却明目张胆地对抗江青同志，狂叫什么：“红旗飘里都是红卫兵，说有坏人，没人相信！”江青同志指出：新北大公社是个“很好的革命群众组织，不能垮！”可是井冈山兵团中的这伙反革命小丑，却明目张胆地对抗江青同志，狂叫什么：“新北大公社是法西斯老保！”

去年六月，谢副总理针对北大团、O、飘、井、红臭名远扬的“静坐示威”严正指出：“这是错误的”。可是，牛辉林之流却仗着关王戚林的支持，大叫什么“静坐是100%的革命行动。”

1968年5月4日《新北大》171期第二版，文科抗大班林明江《斗私越深，和毛主席越亲》说：

下了牛头山，出了王八窝，怎么办？是斗争呢？还是逍遥？

下山不久，毛主席发出了“要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当时学校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口号：一个是井冈山的“要周培源”，另一个是新北大公社的“不要燕京要抗大”！两个组织，两个口号，表现了教育革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我应该站在哪一边？是要抗大还是要周培源？我决不能要周培源这个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打倒了陆平、彭珮云，能让它再上来一个周培源吗？要周培源就意味着陆平王朝复辟，就意味着国民党势力卷土重来！

【笔者注：“要周培源”这个口号，不是井冈山兵团总部提出的，而是笔者所在化学系0363“慨尔慷战斗队”自己刷出的大标语。历史奚落了“新北大公社历史系抗大班”——司徒雷登主办的燕京大学仍是我国历史上办得最好的名牌大学，至今令人怀念不已。还有，北大正史《北京大学纪事》2008版，940页记载，1978年7月20日北大接到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周培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经华主席、党中央1978年6月27日批准，周培源为北京大学校长。】

同期第三版，学三食堂工人《造反声明》说：

牛辉林蛊惑井冈山工人说，“你们要生为山上人，死为山上鬼。”呸！工人阶级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毅然决然写出了造反声明。

同一版，《新北大》编者说：

为“牛头山”在反动小集团卖命的只是一小撮，广大兵团战士是受蒙蔽的。看：“干到底”的不干了！

同期第四版《山寨起火，众叛亲离》说：

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少数坏头头及“红旗飘”里的坏人，不顾广大战士的反对，至今仍不切实执行、全面落实中央这一指示。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容忍的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行为。

井冈山兵团不斗刘邓陶，而把矛头指向聶元梓同志，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校文革，在文化大革命第五回合斗争中又在反党集团操纵下阴谋挑起3.29武斗，刺伤聶元梓同志。一系列事实说明井冈山兵团大方向完全错了，已被“红旗飘”里的坏人及其后台所操纵。

【笔者注：北大“文革”是非功罪，已有历史定论。】

1968年5月8日，《新北大》173期第四版，新北大公社红六团、桔子洲、缚苍龙、国际歌《请看井冈山六纵教工支队中的国民党杂牌军》说：

陈仲夫（六纵教工支队黑干将）

陈贼是原历史系讲师。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兄为国民党台湾省第一任省主席。解放前陈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外围组织“燕友社”主要负责人，并在国民党国防部备案。解放前夕，特务头子指定其潜藏于杭州大学，并与北平特务保持密切联系。文化革命中，中统特务吕遵铎介绍陈贼上井冈山，为牛辉林联系京剧演出效尽犬马之劳。现已被我新北大公社红六团揪出打倒。

1968年5月9日，《新北大》174期第一版，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说：

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揪出了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

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打倒了这个反动小集团核心人物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戈华、牛辉林、樊立勤。这是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又一重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北大的又一重大胜利。

包括戈华、牛辉林、樊立勤在内的、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推行了一整套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他们集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个回合中跳出来的反动分子，网罗北大深池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共老手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乌龟王八，组成了自己的骨干队伍；他们蒙蔽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拉起了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包括戈华、牛辉林、樊立勤在内的、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设在北大的桥头堡，是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及其黑后台安插在北大的别动队，是北大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的还乡团，是北大陆平王朝的复仇军。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总部号召新北大公社全体战士，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以实际行动实现我们“站在第一线，保卫毛主席”的钢铁誓言，乘胜前进，奋勇追击，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戈华斗倒斗臭！将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樊立勤捉拿归案！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同期第一版，《关于公布北大井冈山兵团中的反动小集团第一批材料的按语》说：

今天，本刊公布井冈山兵团中的反动小集团的中坚分子牛辉林、戈华、樊立勤的一批综合材料，这仅仅是他们进行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一个缩影。

牛辉林是江青同志去年九月一日点名的“红旗飘”中的坏人；樊立勤是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东方红”的代表人物；戈华是个具有反革命经验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井冈山兵团的黑高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上窜下跳，四处点火，活跃异常，闹得很凶，表演得很充分。有些好心人曾误认为他们是什么“革命闯将”、“革命干部”，其实，他们是一小撮地地道道恶蛇恶狗，

是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由这一小撮人为骨干组成井冈山兵团中的反动小集团，是十足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他们的基本队伍是由间谍、特务、叛徒、右派、反共老手、反动权威以及社会渣滓等乌龟王八所构成。

同期第二版《北大井冈山反动小集团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罪行》，对于牛辉林和北大“井冈山兵团”极尽罗织攻击之能事。

牛辉林，北大法律系学生，老保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中反动小集团的坏头头，江青同志公开点名的“红旗飘”里的头号坏人。一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小丑。

牛辉林的父亲是个逃兵，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受群众批斗，牛辉林对此极为仇恨。

文化大革命以来，牛辉林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死心塌地追随刘邓黑司令部，疯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江青同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反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勾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鼓动老保翻天，大刮翻案黑风，大搞打砸抢抄抓，破坏校内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一) 一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江青同志，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而牛辉林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指使下，疯狂地围攻这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恶毒地咒骂这是“历史的误会”。在刘邓黑司令部的小爪牙杨余傅、王关戚反党集团的指使下，伙同反革命分子洪涛，狗胆包天伪造“最高指示”，广为印发，流毒全国，犯下滔天的罪行。他对毛主席发出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十分不满，叫嚷：“现在怎么搞的，军队都拿枪上街了！”毛主席说：“军政训练好。”牛大唱反调，公开咒骂“军政训练好个屁！”并恶毒攻击北大军训是“血淋淋的军训”。当江青同志指出“不参加军训能当红卫兵吗？”牛立即叫嚣“我就不参加军训”，猖狂已极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揪出了杨余傅、王关戚反党集团后，宣判了“揪军内一小撮”反动思潮的死刑，但反革命小丑牛辉林却疯狂攻击毛主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的指示，叫嚣“揪军内一小撮没有错”，竭力为反党集团翻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井冈山兵团六纵教工支队（是由历史系反共老手周一良、蒋匪特务李原、吕遵谔、攻击毛主席、迫害李讷同志的反革命分子郝斌等组成的）以纪念“一二·九”为名写了一张反革命大字报，事件发生后，牛辉林等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头头公然将现行反革命分子窝藏起来，加以包庇。

反革命分子牛辉林还疯狂地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牛辉林和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六八年一月十五日，北大井冈山小报上登载了一篇矛头直接指向林副统帅的大毒草，并且通过开大会、贴大字报、放高音大喇叭等形式广泛传播，为国内外阶级敌人提供了求之不得的重要情报。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牛辉林就伙同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儿子邓××，反革命分子杨作森反对中央文革的小丑王××等人，按照邓小平的四点黑指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推行所谓的“强硬阶级路线”，组织什么“贫下中农、工人、革干子弟协会”，妄图篡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分裂北大的革命队伍，破坏文化大革命。当他们的这一阴谋被江青同志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揭穿后，牛辉林怀恨在心，曾多次和反革命分子杨作森一起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更为严重的是牛辉林多次在学生中散布极其恶毒的诬蔑江青同志的反革命言论，用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江青同志，是可忍，孰不可忍？

牛辉林对江青同志关于孔、杨、“井”、“红”等问题的一系列正确指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在王关戚反党集团的指使下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江青同志的正确指示，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井冈山”、“红联军”和王任重在北大的代理人孔繁、杨克明翻案，

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明确指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并且公开点了牛辉林的名字，牛对此极为不满，他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说什么“去年她用杨勋（是江青同志公开点名的反革命分子。已被捕）把‘井’、‘红’压垮了，今年她又想把井冈山压垮”等等。六七年九月七日，牛在和反党集团的骨干洪涛、王恩宇等密谈时，疯狂地攻击江青同志的“九一”讲话，说什么“江青说‘红旗飘’里有坏人，没人相信，”“中央首长在北京很多，大家都听惯了，一两次讲话没有多大影响。”真是反动已极。

（二）大反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毁我长城

六七年七、八月，牛辉林参加了一系列由杨余傅、王关戚反党集团策划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黑会，八月九日晚，牛在北大38楼前井冈山兵团的全体大会上作了一个极其反动的“反军演说”竭力煽动“揪军内一小撮”。胡说什么“有个全国性的大暴乱”，“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夜”等等。在此期间，牛还亲自参加或派人参加反党集团召开的反军黑会达二十余次，在牛辉林大反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活动中，以反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四五八七部队最为突出，矛头直接指向林副统帅。

牛辉林勾结军队中的“冲派”，死保肖华。六七年八月，三军“冲派”多次在北大井冈山总部集会，密谋策划大反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肖华被揪出后，牛还指使他的宣传队大演肖华的“组歌”，直到九月十四日，牛辉林召开所谓“拥军大会”，仍将“冲派”捧为座上客。

在牛辉林的策划下，井冈山兵团中的反动小集团勾结石家庄“狂派”，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河北省和石家庄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牛本人则多次在大会上高呼“誓做‘狂派’的坚强后盾”！“誓与‘狂派’战斗在一起！”当六八年一月陈伯达同志宣判了“狂派”的死刑后，牛还派人去保定，攻击伯达同志，挑拨军民关系。

六七年九月，反党集团被揪出后，牛辉林竭力为王关戚之流鸣冤叫屈，竭力为反党集团翻案。

（三）反革命分子牛辉林是杨余傅王关戚反党阴谋集团的叭儿狗

在“一月夺权”中，牛辉林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开始投靠王关戚反党阴谋集团。

六七年三月份，牛先后向反党阴谋集团的重要成员洪涛、徐非光等人汇报北大情况和反聂计划，王关戚反党集团对牛十分赏识，并给专门指定了三个和牛辉林联系人，积极为牛向反党集团转报材料。从此，牛就以“红旗飘”的头头、反党集团的一员开始了有领导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

反党集团一直把牛辉林等反革命小丑所操纵的井冈山兵团看作他们的一支别动队。六七年五月，反革命分子洪涛向反党集团介绍北大“飘派”时说：“‘飘派’有四十几人，人虽少，战斗力很强。‘飘派’特别注意保密，都是单线联系，许多人彼此还不认识。……‘飘派’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和北大这一仗，在北大内部主要靠‘飘派’”，“我们坚决支持‘飘派’”。

王关戚反党集团通过多种途径和牛辉林联系。和牛辉林有直接黑线联系的已查明的有：

反党集团骨干 张经武 （已被捕）

反党集团骨干 洪 涛 （已被捕）

反党集团骨干 王恩宇 （已被捕）

反党集团骨干 刘 郢 （已被捕）

反党集团骨干 徐非光 （已被捕）

反党集团骨干 关锋的老婆周英

此外，反党集团还有大批联络员和牛辉林联系。这些联络员的任务是：

1. 收集北大的情况，向反党集团汇报；
2. 向牛辉林等人传达反党集团的黑指示。

在井冈山兵团成立前夕，牛辉林和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洪涛等人进行多次密谈。连兵团的名称、谁当第一把手以及以后斗争的策略等等，反党集团都作了详细研究和规定。

直到六七年九月，反党集团被揪出后，牛辉林仍与反党集团密切联系，负隅顽抗。

(四)反革命分子牛辉林是北大“红旗飘”里的头号坏人，井冈山中反动小集团的核心分子

以牛辉林为首的“红旗飘”是由一批对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亡命徒”组成的，其骨干分子中有思想一贯反动、恶毒攻击毛主席、现已被捕法办的现行反革命胡根初，反动组织“中国X小组”的负责人、现已被逮捕法办的重大现行反革命谢世扬等。【笔者注：“X小组”指郭世英“X诗社”。郭世英系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死于“文革”期间1968年。】

在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小爪牙指挥下，以牛辉林为首的“红旗飘”的坏人、樊立勤为首的“东方红”的坏人和以戈华为代表的走资派、特务、叛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相互勾结的统治下，井冈山兵团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反特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纵容老保翻天，顽固坚持“打倒聂元梓、砸烂校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纲领，顽固地对抗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三月二十五日以来，在牛辉林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勾结校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北大多次挑起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并指使反革命暴徒刺杀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聶元梓同志，打伤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同志，制造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四点指示”下达后，牛辉林等疯狂对抗，拒绝执行，并进行了一系列反抗中央的活动。他们不仅至今拒不交出凶手，反而变本加利，不断地挑起武斗，制造谣言，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继续破坏文化大革命。

牛辉林是一个罪行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必须立即捉拿归案。

1968年5月13日175期第二版，门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李文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红一团战联队《牛辉林猖狂攻击江青同志必须坚决镇压》说：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说：“红旗飘里准有坏人。”

红旗飘里准有坏人！这个坏人是谁？

现已查明，这个红旗飘里的头号坏人，就是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的核心人物，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牛辉林坏话说尽，坏事做绝，罪大恶极，必须坚

决镇压！

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炮打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铁证如山。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江青同志就指出“牛辉林说我的坏话”，给牛辉林的这一反动罪行定了案。【笔者注：本文附三个版本的江青“九·一讲话”，根本没有“牛辉林说我的坏话”。“新北大公社”门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李文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红一团战联队，无中生有了“牛辉林说我的坏话”，刊登在聂氏喉舌《新北大》。在“文革”时代，这句话是可以置牛辉林和“井冈山”于死地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对党和人民犯下了千条万条罪，但是只有凭他疯狂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一条罪就该关！该管！该杀！

同期第二版，本刊评论员文章《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叫他人头落地》说：

蚍蜉撼树谈何易，历史的辩证法要把那些倒行逆施的小丑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小小爬虫牛辉林竟敢攻击江青同志，我们就叫他人头落地！

同期第四版，新北大工程兵部队《造反下山战士说话了一一粉碎孔杨牛侯的谣言战术》闫博德说：

我造反下山就是因为首长讲话了。井冈山兵团是个什么东西看透了。过去传达首长讲话，我两边都听，结果总是不一样。牛辉林他们从前总是讲吴传启如何如何好，关锋、林杰如何如何支持，死保关王林，今年二月看得更清楚了，他们就是和杨余傅一起搞聶元梓嘛！聶元梓同志是毛主席树起来的，有缺点、错误，但江青同志说还要保，我就应该支持。

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178期第一版，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说：

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揪出了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之后，在打倒了这个反动小集团的第一批核心成员、现行反革命分子戈华、牛辉林、樊立勤之后，乘胜前进、奋勇追击，今天，又揪出了井冈山兵团反动小

集团的第二批核心成员张侠、张景元、俞启义。

由于反革命的共同需要，张侠、张景元、俞启义和戈华、牛辉林、樊立勤等人结成死党，上下串连，八方搭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马前卒，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他们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历来就是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争夺的重要阵地。由戈华、牛辉林、樊立勤、张侠、张景元、俞启义及其他一些反革命分子组成的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授意下，提出了一整套反对、破坏、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政治纲领。

为了更有效地对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及其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新北大公社总部号召：新北大公社全体战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团结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尤其是井冈山兵团中广大革命和要革命的同志，发挥出每一个革命同志的主观能动性，将戈华、张侠斗倒斗臭，将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樊立勤、张景元、俞启义捉拿归案，继续奋勇前进，在夺取新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立新功！

打倒张侠！打倒张景元！打倒俞启义！

打倒戈华！打倒牛辉林！打倒樊立勤！

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同期第三版，文科抗大班《北大老保井冈山的十黑》：

一个黑班底——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反动小集团

北大井冈山中有一个反动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这个反动小集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大的代表，它是由下列几种反动势力所组成：（1）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如戈华、李建武、文重、肖永清之流；（2）反共老手、反动权威、洋奴，如季羨林、周一良、侯仁之之流；（3）国民党残余、特务等，如陈仲夫、赵占元之流；（4）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小丑，如牛辉林、樊立勤、谢世扬之流；（5）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人物，

如孔繁、杨克明之流。

同期第四版，新北大公社舞东风《反动的流派，反动的理论——评北大井冈山兵团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谬论》说：

“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夜论”——牛辉林从王关戚哪儿批发了这种反革命理论回校后，即作了臭名昭著的8·13反军演说，狂呼“第三次大串连万岁！”

1968年6月1日《新北大》180期第四版，《反动的流派，反动的理论》说：

北大民谣说道：“牛头山三件宝，造谣、武斗、捞稻草。”这是对井冈山反动小集团反革命斗争策略入骨的揭露。

江青同志指出：“牛辉林到处搞打砸抢，是有人授命的。”曾授命于这个反动小集团的王关戚、杨余傅统统完蛋了，目前仍继续授命于反动小集团的一切反革命两面派，也绝对逃不脱灭亡的命运。

1968年6月7日《新北大》182期第二版，新北大第二期两派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原井冈山兵团全体学员《给井冈山中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说：

严峻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王关戚反党集团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牛辉林、戈华之流，正是利用校文革和聶元梓同志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先拉队伍，然后无限上纲，肆意歪曲中央首长的讲话，从而达到他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184、185期第四版，激扬《祖传败方的新花样》说：

戈华不是三反分子、特务、现行反革命吗？张侠不是走资派、假党员吗？俞启义、牛辉林等人不是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吗？

1968年7月5日《新北大》190、191期第四版，本刊讯《穷追猛打，全歼顽敌，我校革命师生集会批斗井冈山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

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卢平同志首先发言，他指出：我们破获的以牛辉林为首的操纵北大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他们丧心病狂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

阶级司令部，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共戴天的死敌。

批斗会上，已落网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被揪出示众。

会后，革命师生押着陆平彭珮云和已落网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同期第四版，原井冈山兵团 09 纵钱兆和《我们不再受骗了》说：

我是北大井冈山 09 纵战士，再早是牛辉林的嫡系“红旗飘”一员，说来也是牛辉林反动小集团向新北大红色政权猖狂进攻的得力打手。

牛辉林之流为了维持其奄奄一息的厄运，承袭了其主子“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衣钵，不择手段地大搞政治欺骗。

1968年7月17日《新北大》193期第三版，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言人《关于老保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命令》：

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侯汉清们：

操纵你们那个保守组织井冈兵团的，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活动、有野心、有后台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牛辉林等人是一伙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黑帮。

迄今为止，你们还在死保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还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窝藏在井冈山兵团总部。我们认为，你们这样做是很不聪明的，是非常愚蠢的，是对你们不利的。

你们也该想一想，你们和牛辉林等人之间的关系大家是清楚的：关帝庙进香是一起去的，杨余傅的黑线是一块牵的，反革命活动是一起干的。牛辉林等人被揪了出来，你们理应该做些摆脱关系的动作才是。

可是，你们现在却一声不吭，死死地拖住牛尾巴不放。这一下子不就把你们和牛辉林同党的面目暴露得太清楚了吗？这一下子，不是把你们用以欺骗兵团战士的“左派”面具撕得精光了吗？如今你们怎么拙笨到如此地步了呢？

为此，我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言人奉命发布命令：你们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

革命分子牛辉林！

要知道，你们盘踞山寨的日子已经不长了，你们不交出牛辉林，要革命的兵团战士会交出牛辉林。总有一天，他们将押着牛辉林，连同你们这些牛辉林的同党们，从山寨里冲杀出来的！

何去何从，你们迅速抉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一次机会了！烈火已经烧到山寨门口，稍有贻误，定将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与牛辉林同归于尽！

切切此令！

同期第三版，通栏标题《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总部给井冈山兵团中要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井冈山兵团中要革命的同志们：

在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问题上，你们将采取什么态度呢？你们还怀疑井冈山兵团里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吗？你们还认为牛辉林等人不是红旗飘里的坏人吗？

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伙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攻击中央文革和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以侯汉清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对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他们表面上是不表态的，实际上，不表态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态度就是死保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

与侯汉清是患难之交的徐运朴已经落网了，已经交代了，已经认罪了。【笔者注：俄语系研究生徐运朴，被聶氏“校文革”派人从黑龙江老家抓回北大，严刑逼供，打断腿，写下《认罪书》，用大箩筐抬上台批斗。】侯汉清的罪行不久也可以公布于众，侯汉清也跑不了！

同期第四版，井冈山兵团一千四百名造反下山战士《勒令侯汉清们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严正声明》说：

令人气愤的是老保井冈山兵团现总部侯汉清们迄今为止还在死保这个现行反革命集

团，他们还把牛辉林这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窝藏在井冈山兵团，我们要正告侯汉清们，想玩弄权术，蒙混过关，这是痴心妄想！

同期第四版，徐运朴《井冈山兵团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徐运朴的认罪书》说：

我是北大井冈山中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我和牛辉林等一伙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起疯狂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起订下反革命攻守同盟。现在我决心同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决裂，彻底揭发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全部罪行，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靠拢，以求得毛主席和人民的宽恕，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同期第三版，《简明新闻》：

一、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下，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写了交代，徐运朴写了认罪书，揭发了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将于明天召开首次公审大会，审判这伙现行反革命分子。

二、新北大公社 251 个战斗队联合发表声明，强硬勒令井冈山兵团总部侯汉清们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匪首牛辉林。【笔者注：不言而喻，“北大井冈山兵团”5000 余群众，就是“匪众”了。】

1968 年 7 月 23 日《新北大》194 期第三版，通栏标题《我校首次公审操纵北大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徐运朴》报道（原报纸注明“公审徐运朴纪实从略”）：

公审牛泰升

审：牛泰升，你交代，你们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是怎样形成的？

牛：一九六七年九月份，关王林反党集团彻底倒台后，江青同志很英明地指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并且指出牛辉林这个人到处抢，是有人授命给他的。从此以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许多重要成员便公开地发江青同志的牢骚，恶毒地攻击同志。

公审王忠林

审：你自己揭发、交代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全部罪行

王：我们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在 25 楼 307、25 楼 234 和 28 楼 406 等许多地方，用大量的极其恶毒的话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攻击中央文革和敬爱的江青同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

我们主要是利用所谓聊天、辩论、业余时间讨论问题，含沙射影或者是公开地进行攻击。

我们那个反革命集团成员有牛辉林、牛泰升、我、屈长江、王明德、李怀进、何本芳、唐竞，还有徐运朴是和牛辉林单线联系。

1968 年 7 月 24 日《新北大》195 期第二版，新北大公社工程兵部队《牛侯之流对抗七三布告挑起武斗的新罪行》说：

继 3. 28-3. 29、4. 26 大规模武斗以后，北京大学又发生了 7. 22-7. 23 大规模武斗事件，这件事，已经震动了全市，引起了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注。

一、牛辉林、侯汉清们挑起 7. 22-7. 23 武斗的经过

7. 22、7. 23 武斗事件是牛辉林侯汉清们蓄谋已久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反革命行动。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多，正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不久，牛辉林侯汉清【笔者注：詈语，谓侯汉清，报纸原文如此】们经过周密策划，封锁街道，偷架高压线，偷筑工事，运进大批武斗凶器和物资，为进一步武斗升级作好准备。

七月二十二日晚八点多，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办公楼隆重集会，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 三’布告誓师大会”，井冈山兵团疯狂破坏大会，晚十点，井冈山兵团百余名暴徒，突然从 37 楼狗洞爬出，堵死马路，严密封锁，用大量木床、暖气管、在马路上修筑武斗工事，地下铺满砂子、铁钉，并在马路对面食堂下架设土炮，继续偷运武斗凶器和武斗升级物品，继续架设高压线。【笔者注：“新北大公社工程兵部队”把井冈山割据区通往校外的唯一通道称为“狗洞”。捏造“地下铺满砂子、铁钉”，实际上是井

冈山在马路撒了一些绿豆。“架设土炮”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井冈山”在被聂氏“校文革”校内断电的情况下，不得不从校外马路边高压电线杆向己方防区37楼冒险带电接线，引入电源。】

晚十点五十分，他们突然烧毁北京大学的变压器，造成全校停电的反革命事件。【笔者注：实情见《记忆》207期胡志远、耿天鹏、温标、樊能廷《北大文革中“监听电话”纪实》。】

与此同时，他们用强力弹弓封锁了一切通路，打断高压线数根，使海淀部分地区陷入一片黑暗。

晚十一点左右，灭绝人性的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悍然向我公社战士投掷了几百枚燃烧瓶，并发射土炮致使武斗升级。这是直接对抗“七·三”布告，破坏“七·二三”全市大会的严重反革命行为。

直到二十三日凌晨三点半，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一小撮法西斯暴徒还向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投掷燃烧瓶，阴谋进一步扩大事态，进行更大的政治冒险。

这就是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挑动7.22-7.23武斗的简单经过。

二、“7.22-7.23”武斗是一起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正当市革委会于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召开重要会议，决定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时候，正当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刚刚举行了坚决保卫“布告”誓师大会以后，正当七月二十三日全市准备举行两万人大会，由谢副总理亲自带领队伍举行拥护“七·三”布告大游行的前一天，牛辉林、侯汉青【笔者注：“清”之误】们挑起了大规模武斗，这是公开对抗、疯狂破坏7.23大会的现行反革命活动，这是一小撮反革命亡命徒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挑战，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挑战，这是继3.28-3.29反革命武装夺权以后又一起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三、牛辉林、侯汉清们为什么要挑起7.22-7.23大规模武斗？

和3.28-3.29武斗一样，7.22-7.23反革命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北大阶级

斗争的必然，这是牛辉林、侯汉清们反革命本质的大暴露。阶级敌人在政治上没落的时候，总是要乞求于武斗，以挽救失败的命运。武斗也总是随着敌人的失败和临近灭亡而升级的。

自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3.29《四项决定》宣告北大井冈山兵团政治上彻底失败以后，牛辉林、侯汉清的元气再也无法恢复。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了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井冈山兵团1700余名革命同志造反下山。这象挖了牛辉林、侯汉清们的祖坟一样，使他们陷入全线崩溃、全军复没的命运，特别是最近谢副总理、吴德等首长都明确指出，北大问题由北大自己解决，依靠红色政权解决。这是对新北大红色政权和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有力的支持，这是对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的致命打击！

由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它给一切阶级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牛辉林、侯汉清们从《七三布告》中看到了他们的死亡命运。

在即将灭亡的前夕，他们狗急跳墙了。他们终于在7.23大会前一天，即7月22日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猖狂反扑了！终于又一次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战了！

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了捍卫七三布告，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我们的斗争将在新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战斗的光辉！

对抗七·三布告，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7.23大会，挑起7.22-7.23武斗的牛辉林、侯汉清们，必将更快地爬进自己的地狱！

同期第三版，新北大公社门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工程兵部队《井冈山兵团在第五个回合中的表演》说：

在傅崇碧之流狗胆包天，派出亲信哈斯、陈××两次来北大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名单，摸“1.15”反革命小报揭发单位《中南海警卫团》的组织情况的同时，是他们密切配合，并公然谋杀“1.15”反革命小报的揭发者贾瑞珍同志。

如果人们从他们的公开的表演还看得不大清楚的话，再听一听井冈山兵团中的现行反

革命集团在幕后说的几段黑话，问题就更清楚了。

今年三月初，一次牛辉林从高校学习班回来，在28楼406对王忠林等人说：“在学习班真有意思，×××都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总和我们聊天，孟队长他们有时进来。孟队长他们和我们非常亲热，没有什么隔阂，孟队长他们态度很明显了。要说谁没有派性，才活见鬼，这里的×××就是我们这一派的。”

这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等人对高校学习班的看法。所谓孟队长者，就是傅崇碧之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忠实推行者。在高校学习班中，井冈山兵团中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站在哪个阶级一边，执行哪个阶级的路践，不是清清楚楚了吗？

今年二月份，还是在28楼406，还是牛辉林、王忠林等人，他们在谈及孟××之流炮制的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北大联合方案时，有一段极为露骨的对白，请听：

王忠林说：“他们的方案是从哪儿来的？最怕的又是来自一个黑线上，那我们井冈山这次就砸锅了！”

牛辉林哈哈大笑：“不会的，我们要相信孟政委，相信傅崇碧司令员，他是永远不会牵黑线的！”

王忠林想起第四个回合的惨败，心有余悸，说：“那不一定。”

牛辉林说：“不！不！不！北大这么重要的学校，傅司令员他们不会胡搞的！”

妙极了！清楚极了！又是“相信孟政委”，又是“相信傅崇碧司令员”，人们从这个反革命的“两相信”中，难道还不能看出井冈山兵团中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牵的是谁的黑线，跟的是哪个黑司令部，为哪个阶级效力吗？

应该指出，他们吹捧傅崇碧之流的言论是大量的、一贯的，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傅崇碧之流放一个屁，牛辉林等人都要作一首赞美诗，什么“傅司令员真棒呀”，什么“傅司令员讲话很有气魄”呀，什么“傅司令员有一次不理睬孙蓬一，是立场真鲜明”呀，什么“傅崇碧司令员这人的确是很直的”呀，“我看中央现在就是让这些直来直往的将军们和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让你没办法”呀。等等，等等。把傅崇碧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美化

得简直比神仙还神。在牛辉林们眼里，新主子杨余傅比起旧主子王关戚来，显然更加高大。

对于这一切，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早已心中有数了的，今年三月，牛辉林等人在中央首长两次接见中蠢动十八次而得不到一次发言的机会，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明确的表态。这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井冈山兵团中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在高校学习班的表演所作的最恰当的评价！

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196期第一版，本刊编辑部《北京大学的革命火焰》说：

当牛辉林、徐运朴、侯汉清拉起队伍，与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分庭抗礼的时候，江青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

当戈华、张侠等乌龟王八伙同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时，江青同志果断地指出：“北大是老保翻天。”

当王关戚反党集团疯狂围攻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时候，江青同志支持我们说：“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

同期第三版，新北大公社红鹰《操纵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抗中央文革必须坚决镇压》说：

一切阶级敌人都对中央文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操纵老保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集中地代表了一小撮被打倒了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的利益，他们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刘邓黑司令部翻案，为一切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翻案。特别是早在六六年，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推行所谓强硬阶级路线，拼凑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的时候，就受到江青同志的严厉批判，后来，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又先后几次受到江青同志点名批评，所以，操纵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对中央文革特别怀恨。他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央文革，用最恶毒的语言对中央文革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污蔑和诽谤。他们叫嚷什么中央文革犯了“××错误”呀，狂吠什么中央文革对干部“打击面过宽”呀，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笔者注：“井冈山”少数人私下议论“中央文革对干部打击面过宽”，聂派就认为是“狗胆

包天，罪该万死”。】

1968年7月30日《新北大》197期第二版，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坚决支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七二八通告的声明》说：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以牛辉林为首的包括牛泰升、徐运朴、李怀进、王忠林、王明德、屈长江、何本芳、唐竞等在内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伙同井冈山兵团总部侯汉清、靳枫毅、胡纯和、谢纪康、朱孔富等人，兴风作浪，挑动武斗，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七月二十八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又亲自做了指示。我们再次命令井冈山兵团总部侯汉清等人，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牛辉林，交出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漏网成员李怀进、屈长江、何本芳、唐竞以及樊立勤、张景元、俞启义，以立功自赎，求得宽大处理。否则，必将从严处理。

同期第三版，文二（四）一支队《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说：

新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面临着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我们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临近全面胜利的时刻，必须保持百倍的警惕，无情地揭露牛辉林们疯狂破坏七·二八指示落实的阴谋，如同过去无情地粉碎他们反革命舆论围剿和武力夺权的罪恶阴谋一样。对以牛辉林为首的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我们一定要毫不手软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968年8月3日《新北大》198期第一版，社论《军民团结紧，携手立新功》说：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一周年，对操纵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牛辉林之流来说，是多么难过啊！想当初，他们在王关戚、杨余傅的操纵下，大揪“军内一小撮”，死保彭德怀、罗瑞卿、贺龙、肖华之流，大反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矛头直指林副主席。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宣判了这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集团的死刑！

同期第二版，新北大校文革第六期两派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学员《要听毛主席

的话，不要被反革命小集团牵着走》说：

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令人气愤的是井冈山兵团总部牛辉林、侯汉清们，对毛主席最新指示却置若罔闻，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断章取义，阳奉阴违，顽固对抗主席最新指示，叫嚣什么“聶元梓伪造最高指示”，把斗争锋芒直指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

同期第三版，新北大公社八一兵团“锓未残”《批臭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反军叫嚣》说：

操纵北大老保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牛辉林罪恶累累。去年八月九日的反军演说是一棵反革命大毒草，是代表北大国民党反动派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猖狂进攻的号召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视察大江南北时，明确地给我们指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但是牛辉林秉承王、关、戚的旨意，竟然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唱反调，把全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牛辉林的同党侯汉清也亲率二百余人到上海大反革委会。……当关帝庙黑干将王恩宇恶毒污蔑“军队领导90%是保守的”时候，牛辉林就狂叫解放军“在全国对造反派进行镇压。”林副主席树立起来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革敢保，赢得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高度赞扬，成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的好榜样。当关帝庙里恶毒攻击说：“三军在国家机关都支持保守派”的时候，牛辉林就鹦鹉学舌，跟着恶毒攻击“三军是保守派”、“三军是三大老保之一”等等，并和“冲派”密切勾结，大整三军黑材料。……正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反革命两面派如萧华浴血奋战的时候，牛辉林之流却操纵老保井冈山，勾结冲派，在校内外大唱《萧华组歌》，为萧华树碑立传；当王关戚萧华之流被打倒之后，反革命分子牛辉林之流又卖身投靠傅崇碧，把傅崇碧的叭儿狗都视为亲爹。对傅崇碧本人，牛辉林更是极力吹捧；说什么“我早就知道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他跟63军观点是不一样的”，“傅崇碧司令员，他是永远不会牵黑线的”，“北大这么重要的学校，傅司令员他们不会

胡搞的”，“傅司令员立场真鲜明”，“傅司令员这人确实很直”，“傅司令员真棒！”等等等等，奴颜婢膝，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傅崇碧支持牛头山，牛辉林吹捧傅崇碧，主子奴才，一条黑线！……毛主席指示我们要“拥政爱民”。操纵井冈山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牛辉林如此疯狂地对抗最高指示，向我钢铁长城挑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牛辉林之流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不过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今天，历史已经宣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死刑！

1968年8月8日《新北大》199期第三版，新北大公社狂飙《自掘坟墓的牛侯之流》说：

一贯敌视最高指示、仇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再也按捺不住反革命的疯狂心理了，他们不再安于躲在小屋里“议论议论”，而是一丝不挂地跳将出来，张牙舞爪，青面獠牙，做了一系列最疯狂的表演，最绝望的挣扎。

同期第四版，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共党史编写组、新北大公社毛泽东思想万岁战斗团《刘少奇就是五次叛变的大叛徒》说：

在北京大学，不是就有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躲在小屋子里议论，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操纵北大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牛辉林，在今年三月江青同志指出刘少奇是五次叛变的大叛徒以后还死保说：“五次叛变，可能吗？”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另一个头子侯汉清更不示弱，直至今年六月还愤愤不平地说：“把什么错误都算在刘、邓身上，不合理。这不是墙倒众人推吗？”

牛辉林、侯汉清这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怀着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代表了被打倒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充当了为大叛徒刘少奇翻案的马前卒。

1968年8月17日《新北大》第200期第四版，新北大公社顶风船《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说：

“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疯狂破坏毛主席的伟

大战略部署。”

* * *

历经“文革”十年浩劫，水落石出——牛辉林根本不是坏人，“红旗飘”里一个坏人也没有。相反，江青、聂元梓是举世皆知的坏人，北大聂氏“校文革”是“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

1967年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上讲话“‘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是北大聶元梓和聂派窜改江青讲话词句，用以打压对立派“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政治“千钧棒”。■

【文摘】

北大“四清”试点

杨 勋

1963年从农村搞起的“四清”，1964年延伸到了大学。北大被当作全国高等学校的“四清”试点，要先行一步。就在这年的冬天，来自全国的200多名高级宣传文教官员齐集北大校园，开始了“四清”大会战，正式名义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的社教工作队队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副队长有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等。

社教工作队进驻北大后，北大的政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由于工作队员都是大干部，又是运动试点单位，他们的活动声势很大。工作队布置运动一般都在办公楼召开干部会。这种会我都参加。记得有一次大会从晚饭后一直开到深夜。张磐石同志分析运动形势和布置工作，声调严肃，布置周密，给人的感觉就像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下令攻打冬宫一样。根据张磐石的布置，在那天全校揭发问题已达到高潮，应当立即转入夺权阶段。

经济系在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单位。派来的工作组阵容强大，共有

七人，为首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叶方，成员有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陆维特、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蔡复生等，联络员有中宣部的阮铭、北京市委大学部的李开鼎等。他们不仅资格老职务高，而且一副派头很大的样子。这些高级干部开会时不像教师们那样随便，他们端坐在会议桌两旁，散发着一股说不清的威严气氛。他们当时大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他们在开会时，桌前同时摆放着几副明煌煌金闪闪的高级眼镜，而且都以很权威的口气讲话，那架势使从未出过校门的“三门干部”们大开眼界。当时在我心目中，这也许是一批包青天式的大人物，真要在北大大战一场，北大真要新生了。

由于有了反右倾的挫折和锻炼，我也能发现学校和系的不少问题。党员干部们一般都出身不好，胆子小，没有自己的政治头脑，上边布置什么就紧跟照办。三年困难那几年由于吃不上饭，人们情绪低落，系里、班里出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除了1959级学生那种政治问题外，还有不少生活作风道德品质问题，如偷盗和男女关系等。相比之下，我倒是显得干净纯洁，只关心党和国家命运、政治是非，于是更加强了自信心。从情感上我是一向厌恶那些男盗女娼粗俗勾当的，所以觉得能借这次“四清”运动把这些问题清一清也很有必要。抱着这种态度，我积极地参加了学校和系的除出党“四清”，主动靠近工作队，积极反映情况，成了名副其实的社教积极分子，不顾正在吃奶的孩子，不管家，又去闹革命了。

“四清”运动中很讲阶级成分和出身历史。出身好的人明显得势。在经济系我和严庆珍比较亲近。严的父亲也是抗日时期的八路军干部，她本人解放后参加工作，后来由工农速成中学而上大学。我和她同龄，经历接近，很谈得来。“四清”开始后，我和严都是积极分子，我们一起去拜访工作组的同志，特别是对老资格的蔡复生，从心眼里信任佩服，把工作队的人当作前辈叔叔伯伯相待，幻想工作队能让北大回到人民手中，实际上接受了北大不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提法。

工作队进校后积极组织阶级队伍，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然后把揭发出的问题“梳辫子”归类上纲，很快就将矛盾升级了。如经济系揭发的问题有：政经教师鲁达曾

攻击刘少奇因在七大时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而上台；有的党员干部变成小偷；有的学生干部乱搞男女关系；有人因恋爱持刀行凶，等等。面对这些问题，系总支领导软弱无力，界限不清，甚至对犯错误的人纵容包庇，因为那些出问题的人一般原来都是领导的红人。假如他们不是红人，他们就不敢那样猖狂大胆地做坏事。以上这些问题，中层干部早有了了解，但并未把它当成严重问题，工作队进校后很快就把这些问题当成阶级斗争动向狠抓不放，而且把问题整理归类，梳成了“6条辫子”，最后把北大说成是“资产阶级大染缸”、“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等等。于是，号召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们推广桃园经验起来夺权，就是夺原来领导班子的权。这样，矛盾激化了，队伍很快分化了。总支书记龚理嘉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不再满脸堆笑地配合工作队了。有的干部一看总支不行了，就更积极地配合工作队深入揭发问题。在积极分子中，有的人在一夜之间也变得激进起来，紧跟工作队无限上纲。但这时我却跟不上了，我不习惯人云亦云稀里糊涂地跟着跑，也从未想过自己去夺党总支的权！

1965年2月，传达了毛泽东的“二十三条”。社教工作队的高干们一反常态，立即改变了无限上纲、全面夺权的口气，将已揭发的问题一风吹了。他们不仅不再提夺权的口号，而且甩开积极分子在四院楼上的会议室里跟原来的党政干部联欢，准备告别了。他们已奉命立即撤离北大。后来才知道，这是高举刘少奇“后十条”的中宣部工作队和高举毛泽东“二十三条”的北京市委在党的最高层短兵相接了。当时，北大是北京市委彭真的地盘，不买中宣部的账，刘少奇顶不住毛泽东，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的矛头就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突然的转变中，我作为社教运动积极分子，从心底感到失落，莫名其妙，一种被利用被愚弄的感觉涌上心头。当初上“纲”时，我跟不上；现在下“纲”时，我又下不来。面对系里不少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不顾事实地大转弯，我愣了，真想哭！坦白地说，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得失，因为我本来就没想去夺权。我这个人太自由主义，是当不了官、掌不了权的。我只为这么多高智能者的盲从行为而难过！

在那几天，我对大学里的高智者，对当权的党内高干们，都彻底绝望了。在那天的日记中我写道：“我曾全心地信任别人，信任党，崇拜别人，但是，现在看来我只能相信自己了，今后不能再去崇拜别人，要努力塑造自己。”后来这些想法被“文革”中的笔杆子翻出来，当作个人野心家杨勋的反党言论来批判。我清楚地记得，1965年1月的那几天，我心中的自我的确大大地强化了。那年我32岁半，党龄也十七年了。我集中全部智力思考：我遇到的这些本质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这样不假思索的紧跟权势？后来，我才清楚，“二十三条”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取代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领导北大“四清”了。这时，我开始明白我心中神圣的党原来并不是坚如磐石般的统一，而且权力集中在中央上层，中下层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只不过是斗争的工具。他们如若不愿做这金字塔式权力机器的螺丝钉，就只有受苦受难了。

1965年“五一”节前夕，浩浩荡荡开进北大的社教工作队悄悄地撤走了。彭真决定利用暑假把北大的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在位于北京市委附近正义路的国际饭店进行整风，把“四清”试点搞乱的队伍严加整顿，重新统一起来。参加这次整风会议的有学校和各系的干部及“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济系除了系里原来的党政干部，就是几个积极分子骨干，其中主要成员是李志远、王茂湘和我。有的人不是国际饭店会议的固定成员，不住在会上，只是临时到会。这时，全校的社教积极分子代表人物就是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

聂是河南人，1938年参加革命，人大副校长聂真的妹妹。1961年她通过聂真找了陆平从哈尔滨市委宣传部调来北大，先任经济系副主任，后因同总支书龚理嘉矛盾调哲学系任总支书记。在哲学系她还是不满足，借崇敬鲁迅发牢骚，说鲁迅在北大只不过是一个讲师而不是教授，公然把自己同鲁迅先生相提并论，引起人们反感。“四清”开始后，她想借“四清”之机向党委夺权。

在国际饭店会上，原来的干部以党委书记陆平为代表，他们得到市委大学部的宋硕、彭珮云等人的支持。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由市委书记彭真亲自主持召开。在国际饭店整风会上列席的还有邓拓同志。彭真在动员大会上说：“要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要一

个系一个系地整，直到思想组织都统一在党的原则上。”彭真宣布，不管是什么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统一了的就回校，统一不了的留在国际饭店继续整，直到统一为止。会上的一切费用由市委承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当时的气势，绝不亚于张磐石工作队进校。彭真一向自称是“北京市的土地爷”。记得1956年我刚到北大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大学生毕业分配动员会上听过彭真的报告，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在那次会上，彭真要求大学生们服从国家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说工人农民培养了你们，你们就要为工农服务，回到工农中去。假如谁不服从分配，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关在黑屋子里过一星期，不给吃的，看他服从不服从？针对个别拒绝去边远地区扬言要自杀的学生，他高声说：“我成全你，给你条绳子，你可以去天安门上吊！”就在那次会上，彭真以十分自信的口气宣布他是“北京市的土地爷”。他说：“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把北京打烂了，只要我当市长，一定会重新建设一个新北京！”

对于彭真整治北大的意图，当时我不可能理解，但是从会上的气氛看，我感觉到，这是一场不寻常的恶战。不论是大会小会，斗争双方都很硬，每天都是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但我不明白背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在国际饭店会上，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一般成员，本来可以是旁观席上的观众的，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我的中立地位很快就稳不住了。虽然我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干部政策问题并不感兴趣（如李志远一再重复的“该提拔的没提拔，不该提拔的提拔了”之类），对已揭发的问题上“纲”下“纲”，我也跟不上。概括地说，当时我对双方都不信服。但是，从个人经历和我的思想感情上，我还是倾向于以李志远为首的解放区来的一派，对龚理嘉等人因形势有利而飞扬跋扈的样子很看不惯，对李志远、王茂湘等人受压制排挤，有些同情。于是，我就基本上成了积极分子这一派了，而且我的情绪变得很激昂，唱着抗战时期的歌曲，要为“真理而斗争”。就这样，经济系的几十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死去活来地斗了半年，直到9月开学后才回校。这时，别的系，特别是一些理科系，早就回校了，有的只呆了半个月，问题就解决了。国庆节前后，只有哲学系仍然留在饭店继续

斗，轮流主持会的是陆平和彭珮云，被整的一方主角是聂元梓。在一次会上，我看到坐在台前的彭珮云和聂元梓，表情都很强硬。

从国际饭店回校不久，我就被派到朝阳区高碑店人民公社参加农村的“四清”了。哲学系的人直到11月人民日报批判“海瑞罢官”，上海的姚文元、张春桥们打到北京城下，才从国际饭店撤出来。这时，彭真已经顾不上北大了。这时，彭真这位不可一世的北京土地爷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铁扫帚，也不得不后退了。哲学系在国际饭店的斗争，前后持续了8个多月时间，埋下了北大文革的种子。聂元梓从此走进了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的左派行列，走向了全中国，走进了中国现代史，也同我们这些不买她账的“左派战友”结下了不解之怨。

高碑店“四清”工作队是由北大师生和朝阳区各机关工厂调集的干部混合编队组成的，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是国棉三厂的工会主席万云同志。万云是从抗日根据地来的干部，年龄比我大几岁，人很朴实随和，说话直快，我们在一起处的很好，什么都说。万云从1964年就调出来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1964年同北大历史系教师郝斌、学生李讷等一起在顺义农村“四清”。她同我讲了李讷任性，江青无原则保护她的宝贝女儿的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万云是个办事认真，待人诚恳，作风平易近人又敢于负责任的人。李讷被西方记者称为共产党中国的红色公主，她任性起来，谁敢管？万云则不管你是谁，该管的就管，不怕得罪人！万云是山东人，是万里的妹妹，我对那里的老乡太熟悉了，就是那种作风。

在小花园队“四清”，前后约有半年时间。正当我们在农村全心参加“四清”时，聂元梓却为了逃避下乡，也为了寻求政治保护，跟一位叫吴溉之的高级老干部结婚了。据说，吴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老资格党员干部，部长级别。跟这种人一结婚，似乎“社教”中的问题就可以不再追究了。这消息传到高碑店公社，在乡下的北大社教积极分子们无不目瞪口呆，原来还把她当作正确方向的代表，想不到她竟然这样背叛大家，拿原则和婚姻做交易，溜之大吉，真是太卑鄙了。此后，聂元梓的各种丑事被传了个底朝天，连她在哈尔

滨同被划为右派的丈夫打离婚以及在北大8公寓作风不正派被保姆发现等等，都传了出来。至于她揭发北大存在的问题，想夺党委书记大权，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总之，此人不仅政治上投机取巧，一心往上爬，而且道德作风败坏，是一个少有的坏女人。得知这些情况，真叫人哭笑不得，不少积极分子好像挨了一闷棍，我也庆幸自己没有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当年她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时，曾有不少的追随者。北大社教开始后，也有人同她私人关系很密切。聂是三八式老干部，又做过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有一付高官派头，很能唬一般人。记得1962年她刚来北大经济系时穿着白色凉皮鞋、绿色绣花真丝衬衫，真像一个很阔气的有资格的大干部啊！当时经济系有的人曾经忙着帮她搬家，迁户口，办杂事。从人民大学调来的邹鲁风校长的秘书盛皿还跑前跑后处处照顾她。有人可能真以为她是一颗即将跃上北大天空的新星了。曾几何时，剥去伪装后竟是这样一个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是“池浅王八多”，在北大这个大校园里居然什么鸟都有啊！

在经济系，除了少数不了解底细和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多数正派人都鄙视聂元梓这个人，认为她既不象教师，也不象知识分子干部。她当经济系副主任从不讲课，处处摆谱，叫人伺候。住在朗润园八公寓时，她家的保姆喊她少奶奶，她居然答应。这种人哪里像一个党员干部！

在经济系里社教积极分子中，有的人是追随聂元梓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贫农出身的王茂湘，他们常同哲学系聂等一伙人串连，但是经济系的大多数人不买聂的账，其中为首的代表人物就是李志远。李志远是抗战干部，1956年从中央党校调来北大。李原来是中学语文教师，上人民大学后精心研究《资本论》。来北大后讲授《资本论》并编出了《资本论》第一卷讲义。他讲课效果极好，深得广大师生好评。李还是经济系党总支委员，很受群众拥护，在党内外相当有威信。李志远对聂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使聂感到很不自在。在国际饭店会议上，我是倾向李志远的，把他当成良师益友，很信服他的观点和为人，只是他从个人立场出发多次批评党总支的干部政策（“该提拔的不提拔”），给我留下不太好的印象，所以对他的追随也是有保留的。

文革初期的遭遇

1966年6月1日上午，正当我们在小花园街上来来往往照常走动时，广播喇叭里突然播放出了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学报”。顿时，北大的人们像炸了锅一样乱成一团。随后，就听说5月25日聂等贴出大字报后曾在校园里遭到围攻，然后又被欢呼，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6月3日我们被学校的专车接回了燕园，莫名其妙地成了北大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派。回到学校，扑面而来的是一片胜利欢呼，我又愣了。这使我觉得奇怪，又不知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那完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部署，是中央权力最上层斗争的结果。在那影响全中国人命运的变革时刻，北大的秀才们像木偶戏中的小木人一样，被隐藏在幕后的牵线人拉动着乱蹦、乱跳，好像成了不可一世的英雄。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可怜的傀儡。原来，聂元梓等7人的“5·25大字报”是奉了康生（通过他的夫人曹轶欧）的旨意，由聂牵头组织哲学系教师们写的。执笔人是哲学系教师杨克明。因为由聂牵头“挂帅”，于是就成了聂的大字报。“5·25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直指国际饭店会议后党中央围绕文革问题的斗争，代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毛主席一江青的声音。大字报5月25日在北大校园贴出来，当然遭到北大党委和干部们的围攻。聂元梓等由于背后有通天后台，对陆平方面的围攻自然是巍然不动，胸有成竹，而且暗暗高兴。由于康生的运筹策划，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通栏标题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顿时，“聂元梓解放了”，康生也解放了。于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北大燕园里点起，在全中国燃烧起来了。

聂元梓解放了，北大国际饭店会上跟聂元梓一起反对陆平党委的人们也解放了。北大“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们立即都成了革命左派。陆平等成了反革命黑帮，十恶不赦的“走资派”。就这样，全校和各系各单位很快就分成了“保皇”和“革命”的两大派，主

要的划线标准可能就是聂元梓和“5·25大字报”的态度。也不知谁定的，经济系里五大左派的为首者是王茂湘，另外的几位是李志远、杨勋、矫作羽、杨娴。看得出，经济系的左派除我之外都是以王茂湘为中心的一伙人。我当左派的根据，可能一是在国际饭店会上态度鲜明；二是出身好作风正在群众中有威信。

1966年6月3日后，北大的左派战友们神气活现，相互祝贺，一派胜利者的气势。在美丽的校园里，左派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黑帮们却正遭到灭顶之灾。面对这种局面，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因为不再挨整受压了，另一方面是为学校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担心，对得势的聂、孙、王等人从心底里不敢赞同，不能设想他们上台掌权后北大会是个什么样子。王很活跃，经常同哲学系的左派们接触，事事紧跟聂元梓。聂也利用她过去在经济系的影响，重新组织自己的班底。经济系一些头脑机灵的人纷纷投靠王茂湘，多数人犹豫观望。我从内心对这种造反夺权人物反感，警告他们不要把文革当作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对待。但王茂湘的确是拿土地改革的经验来理解文革，他非常关注文革胜利果实的分配，并以自己为中心划线，精心地网罗自己的支持者。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这几位的担心并不是凭空臆想，而是有充分根据的。我熟悉这类人胜过那些“老北大”、“老燕京”，深知这些人敢想敢干的革命劲头，因而担心他们一朝权在手，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北大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不可收拾。我不敢紧跟这些得势的左派，也不赞同原来的当权者，于是行动上又成了孤家寡人、软弱无力的单干户。当然，我内心还是非常自信的。我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只是不擅长于组织串连，形不成什么实际力量罢了。我常为此苦恼，也为此庆幸。庆幸自己永远是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孤立个人。那些了解我的人说我总是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讥笑杨勋像是一个从月球上来的人。我对此并不甘心，但也无力改变自己那不切实际的形象。因此，后来发生的事情，可说是早已命中注定，无可避免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混在左派队伍中。经济系左派头目王茂湘很快就发现我不是他的同党，但我又不是无足轻重可以随便甩开的一个人。在那种火热的斗争环境中，各人的

政治倾向和行事态度都无法掩饰，大大小小的的是非尖锐而迅速地测量着每个人的道德水平、人格和政治判断能力。我跟王茂湘等人的分歧很快就在学校系里暴露无遗，并升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了。这可能就是全中国文革中最早出现的两派斗争。北大经济系成了文革中派性产生的策源地。

王茂湘，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到北大，同他一起来北大的有他的同班同学杨娴。他们与肖灼基都属于那年研究生班的毕业生。王是贫农出身，这在当时是一块金字招牌，特别是在北大这种“五大子弟”占优势的单位，贫苦出身更是难能可贵。在文革初期大讲阶级成分，唯成分论盛行的时候，贫农出身的党员教师还是很有号召力的。王同聂原来都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事，国际饭店会上又同一派，“5·25大字报”被肯定后，王同哲学系的左派们更加来往密切。当时北大的革命大旗掌握在哲学系的左派手中。哲学系历来就有“小北大”之称，这时更不可一世了，简直成了北大的国际警察，谁也不敢惹。王紧跟聂，又是经济系的五大左派之一，没过几天王就被一些人拥为经济系的首席左派了。

在王的周围集合了一批自称苦大仇深的人，如巫宁耕等。他们支持学生们的极左行动，如在校园里给黑帮挂牌拔草游斗，去燕东园抄赵乃抟老先生的家，剪了老先生的胡子，砸碎了老先生六十大寿时范长江为他在景德镇特制的瓷相。我对此深恶痛绝，坚决制止，引起王等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一得势就要求权和利。有一个晚上，王号召大家去城里夺权，他用烟台腔调大声说：“快去，快去，再晚了就只剩下海淀了。”王等人还许愿给教师和干部分房子。他认为左派们应当享受文革的胜利果实。我对聂、孙、王的这一套很反感，而且在公开场合有所流露，很快经济系就有一批人组成了反对王茂湘的32111战斗队，把杨勋当领袖了。32111战斗队的骨干有严庆珍、辛守良、徐雅民、晏志杰、陈为民等。因为我从不进行组织串连，也不参加他们的战斗队的活动，所以被他们称为精神领袖。随后，肖灼基、杨娴也加入了王茂湘一派。就这样，经济系的左派队伍分化成了对立的两派。

随着教师队伍的分派，各年级的学生们也纷纷分为两派。支持杨勋的学生一般的思想很活跃，他们成立了“红色尖刀连”；支持王的一派比较听话，大多是学生干部，他们的组织叫“延安兵团”。这两派在各种是非问题上都尖锐对立，凡是这一派拥护的那一派必定反对，先是在下面争论，后来就开辩论会，写大字报。两边的笔杆子都很硬，出谋划策的也是高手，由于停课闹革命，能言善辩的人才都有机会充分地出来表演。聂、孙、王一派认为自己是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坚定左派，而对立的一派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出身历史也好，根本不买对方的账。

在经济系，跟聂对立一派的旗手是李志远。他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写大字报，分析陆平党委的必然失败。大字报的质量很高，得到不少师生的支持。晏智杰在两派辩论会上击败肖灼基，一份分析文革形势的大字报竟长达200张，那气势，那内容也是高水平了。就这样，很快就在全校掀起了反对聂、孙、王的声势。

在这种激烈的争论和组织分化中，我不由自主地卷了进去。我虽然没有加入哪个战斗队，也未接收学生们送来的“红卫兵”袖章，但旗帜鲜明地写大字报批判文革初期的张承先工作组，加上出身好和老左派的名声，在师生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不在校内串连，不追随哲学系的聂孙左派，而且对他们随便干涉各系的运动表示抵制，在群众访问时曾把他们称为“北大的国际宪兵”，在经济系颇得人心，加上那种不畏权势、无所顾忌的气势，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在本系，甚至在外系也得到对聂元梓不满者的同情和支持。就这样，没过几天，一派反聂势力形成了。支持我的这批人，在赶工作组问题上一般表现左，在“6·18”事件上又表现右。他们自以为有头脑，能独立思考，善于判断，所以不听信聂元梓这位“钦定”左派的话。聂对此十分恼火，于是6月底在东操场的一次集会上，竟然骂这批不听她话的学生是右派。那天我正在台下，听到聂的讲话极为反感。第二天就写了《我们和王茂湘等人的分歧》那张大字报，将聂元梓的问题公开端出来了。

关心政治是非的北大人，不放过任何信息来源。中文系的学生们召开记者招待会打听聂的底细，又公布了“走访杨勋”的大字报。一时间，杨勋的名字响彻校园。经济系成了

重要的信息源。就这样，聂元梓大左派的神奇灵光开始破灭了。自那以后，我同聂、孙、王的对立公开化，我成了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彻底拔除而后快。

对我来说，我确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做出这一选择的。我的为人我的性格都不允许我同她那种人同流合污。我的党性和良心告诉我，决不能面对这种坏人保持沉默。我深知，在当时，这样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因为她是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左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都是这样宣传的。对此，熟知内情的人个个哑口无言。这时我必须像个英雄那样站出来仗义直言。我之所以那样坚定不移无所畏惧，是因为我认定：讲真话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对党和人民最起码的忠诚，决不能昧着良心听任坏人欺骗党中央，欺骗群众，胡作非为。

七月中旬，正当北大校园里的争论热火朝天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大员们接连不断地来北大。有一天中午，我从16楼回佟府，路上看见江青正走在燕南园的围墙里。她头上带着绿色军帽，上身穿着宽袖白衬衫，清秀高雅，满面笑容，很像我心目中的领袖人物。

7月25和26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人又两次来北大，主持全校辩论会，声势浩大，震动全校。

7月25日晚饭后，各系各单位整队进入东操场，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来主持这全校的万人辩论会。大约九点钟，大人物们先后出场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等，站满了东操场的主席台。康生在台上用山东腔调讲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他说：“6月1日毛主席肯定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聂元梓解放了，我们也解放了，因为我们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私下得知康生还说过：“聂元梓是王八蛋也得支持。”这时，我很纳闷：“为什么要支持这种坏人？”很不理解为什么明知是王八蛋也要支持！当时我真担心毛主席被骗了！当我亲耳听到康生这么坚决地支持聂的声音时，就像口里咬着一根木头，知觉麻木了，顿时傻了。

江青在那晚的表演是出乎一切人意外的。那天她穿着米黄色的高跟鞋，会开到中间时，她从主席台后排座位上突然气冲冲地走到主席台前，把正在讲话的康生推到一边，自己对着扩音器大声喊叫起来。她声嘶力竭地对着上万名师生说：“阶级斗争斗到我家里来了”，张韶华的妈妈张文秋是个政治骗子，她把大女儿嫁给了岸英，又把二女儿趁着岸青发病嫁给岸青。岸青根本不需要她们照顾。“我们根本不承认张韶华是我们的儿媳妇”。然后又大声说：“李讷是个好孩子，去年在顺义“四清”，是你们北大的郝斌和万云一起迫害她。”江青一边说一边哭，还说她身体不好，得了一种什么病，很痛苦，头发都掉光了。全场的人被她的这番反常的表演，惊得目瞪口呆。我当时也莫明其妙，没有联想到她是演员会做戏，也没有想到她可能神经不正常，只觉得在这场合她这样讲话不成体统，水平太低，影响不好。江青最后很恳切地对大家说：“毛主席非常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想了解运动中的情况，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到中南海来反映，主席很想见同志们。”她最后还高呼：“同志们万岁！”

7月25日的万人会开到很晚，最后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这次会就成了赶走工作组的大会。张承先工作组是北京市委在6月3日以后，根据刘邓指示派来的。当时毛主席点燃了文革大火后，故意去了南方，把北京的乱摊子留给刘邓。这样刘邓不管怎样都逃不脱他们预设的圈套：要管是镇压革命，不管则叫撒手不管。张承先工作组来北大推行的是刘邓路线，在“6·18”事件中镇压了群众，成了运动的拌脚石，注定是要被撤除的。

7月25日夜里，北大师生对江青的讲话议论纷纷，后来听说各系因评论江青讲话被打成反革命的全校共有30人左右。但是，谁也没有听信她的话，去找毛主席反映情况，只有我那二十岁的傻老弟杨炳章把江青的话当真了，第二天一大早就从他临时住的19楼到佟府来找我。他约我进城去中南海找毛主席反映文革情况。我对他的这个主意开始非常冷淡，一是因为我有了1959年上书被批的教训，对毛主席也不是那样神往了；另外一个原因是“7·25”万人大会上，江青留给人的印象不好，对她的话将信将疑，觉得毛主席是不会

随便接见群众的。杨炳章当时年轻气盛，满腔热情一心要见毛主席，坚持要我陪他去。他说昨晚他在东操场是坐在哲学系的队伍里，还是在最前面。他高中时钻研过黑格尔的逻辑学、辩证法，自称会相面，神秘地对我说：“你看出江青那表情吗？她同康生关系不正常，我们得建议毛主席：不能让她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我听了他的话很吃惊，但仔细想想江青当时的表情，她的言行，的确有点不正常，而且面对她那些胡言乱语，在场的人们谁也无法劝阻她。这很使人担心。当时心想：她是主席夫人，可能除了毛主席谁也管不了她。因为我从万云那里早就知道一些江青的脾气，对于她在北大的表演就特别的敏感，真怕她惹出乱子来。认为真要出问题，还得直接反映给毛主席啊！

杨炳章带上了他早已写好的一封信和几张反映运动情况的校园大字报手抄件，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材料直接交给毛主席。江青既然说毛主席想见革命群众，还是可能见到的。我被他说服了，同意跟他一起进城去中南海找毛主席。我们从佟府出发，先到了中关园一公寓李志远家。我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李志远，然后就满怀信心地离开了他家。李志远的儿子李为群送我们出大门并预祝我们成功。

大约9点钟左右，我们到了中南海—新华门，门岗叫我们去文革接待站。在文革接待站我们填写了登记表就去吃早点了。大约半小时后我们回到了接待站，只见一个中年干部迎面走来招呼我们快上车，一边说：“你们登了记怎么不在这里等着，到处乱跑什么？快上车，首长要接见你们。”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叫到我们，于是立即上了他的车，也不问去哪里。我和杨炳章坐在小轿车的后面，带我们的那位中年干部坐在前面司机旁的位子上。我们谁也不说话，车子从长安街往回开，最后开到了三里河——钓鱼台国宾馆，进了那园子往右边方向走，最后在一幢别墅楼前停下了。

陪我们的那位中年干部把我们领到一个会客室的门口。他让杨炳章在门外的椅子上等着，叫我进去见首长。一进门只见江青坐在一个红沙发上等我们，杨炳章不肯在外面等候，他坚持要进去。江青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就问那青年人是谁，我说是一个学生，她就喊：“戚本禹，叫那大学生也进来。”我这才知道那中年干部就是戚本禹！江青很关心北大的

情况，因为她当晚还要去北大主持全校大会！我向她谈了工作组的情况，6·18的情况，她还说她是诸城人，我们是山东老乡！

杨炳章迫不及待地要求见毛主席，江青说毛主席很忙，今天不能见，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她讲，她会转达毛主席。杨炳章无视江青，坚持要见毛主席，还说有些材料和信件要交给毛主席。江青说：“信和材料可以交她代转。”杨炳章不肯，还是坚持要亲自交给毛主席。最后，真有些僵了，江青的脸色变了，不高兴地说：“你这个要求太高了吧！”杨炳章只好勉强地把他的信和材料交给了江青。信的内容非常简单，好象只有几行字，主要是建议毛主席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并说江青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将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等。

我没有仔细去看那信，只见他最后的署名是“杨勋、杨炳章（杨勋弟）”。我们把信留下就离开了钓鱼台，回了家，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引出什么后果。

7月26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又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全校辩论会，而且是江青亲自主持。我没有进会场去，站在东操场南口附近的旁听人群中。宣布开会后，江青喊杨勋上台发言，我没有去，因为我了解的情况上午都反映了，没必要再上台讲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北大的人，特别是经济系的人，可能以为杨勋跟上面有什么联系，加上我接连不断地写了十几篇大字报（每周一篇）评述北大文革形势，无所保留地大胆发表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建议。于是，杨勋的影响很快在学校和系里传开了。

经济系教师们大多数都站在我一边。我写的大字报有不少是由我口述，别人记录，我最后过目，再由别人抄写张贴的。当时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股力量。杜家芳帮着我记录写大字报，闵庆全先生帮我抄过大字报，樊弘老先生在大饭厅东墙上还帮我贴过大字报。当时反聂确有一股同仇敌忾的气势！他们是认为我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才那样支持我的。

7月底北大文革筹委会成立，要求每系选出一名委员，经济系里选了我，技术物理系是邓朴方，历史系是吴惟能。全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是聂元梓。

8月，毛接见红卫兵，我和吴惟能作为北大总指挥带队去了天安门。这时王茂湘一伙

当然脑火，但是他们找不出我的毛病，两派的争论暂时僵持了一段。

8月初毛主席给聂元梓写了“新北大”的题字，大幅的影印件就贴在大饭厅右边墙上，极为显赫。聂、孙、王他们精心利用这机会大肆活动。

9月份校文革成立时，聂元梓在北大已形成一统天下，当了校文革主任，王成了经济系的文革委员取代了杨勋的地位。我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很失望，对这样的“革命”已经毫无热情了。这时我制止造反派打人抄家也无效了。校园里最热闹时，聂元梓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的五六万人。北大的夺权经验和整黑帮经验流传全国。但两派间的斗争依然不停，相互攻击不遗余力。从四院到学生商店的那条通道上，贴满了两派师生写的关于杨勋的大字报，这条通道当时被称为“杨勋走廊”，吸引了不少校内外的读者。

11月初，“人民日报”抛出了“革命大串连”的号召，步行串连的风吹进了北大校园。满怀革命激情的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地步行去井冈山，我被他们的热情感动了。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上午，我在37楼（经济系学生宿舍）门前把当月的68元工资分给了整装待发的十几位学生。当见到有位叫曾军的四川籍贯一年级女生衣服单薄时，就从身上把一件母亲给我做的小羊皮袄子脱下来给她穿。后来才知道，这群学生并不全是经济系的，也有外系的，其中有技术物理系的邓朴方同班同学张景元。

送走了串连的学生们，我沿着“杨勋走廊”，从现在的三角地往四院走去，仔细地看那些红红绿绿密密麻麻的两派师生写出的大字报，反对者和支持者的文字都使我感到吃惊。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样攻击我或吹捧我。我不敢赞同他们的观点，不能对他们关于我的想法的解释负责，更不能容忍他们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胡编乱造。面对这些可爱的青年们的精心笔战，我只觉得心痛、悲哀，真是哭笑不得，心中一片混乱，对当前和以后的革命形势一片渺茫，一点主意也没有了，真象圣经上说的，成了迷路的羔羊。

来来回回看完了这通道上的每篇大字报，然后回到16楼，写下了最后一张大字报——《别了聂元梓》，就一个人踏着燕园的落叶，迎着寒冷的秋风，走出西校门，离开了北大，单身一人也去串连了。在这以前，支持我的学生们和青年教师们，曾几次约我跟他们一起

去外地串连，都被我谢绝了。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红卫兵组织并一再郑重其事地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当时党组织已停止活动），不属于任何一个小派别。之所以孤身一人去串连，是受好奇心的驱使，要一个人走出学校，走出北京，亲自到全国各地看看文化大革命在全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心想：聂元梓既然热衷于在北大称王称霸，在北京当文革领袖，大家都走光，让她自己在这“空园子”里掌权就是了。■

摘自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资料】

把聂三六拿来示众

——聂元梓三月六日两次汇报批注

《新北大报》1968年3月22日（第四版）

按：聂元梓的三六汇报是一篇奇文，是一株大毒草。她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红色政权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她还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的最新指示，把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比作反革命的国际饭店会议，其反动气焰何其嚣张！下面我们把这篇奇文略加批注，以飨读者。

第一次：

今天我见到中央首长同志，心情非常激动，我有许多话要向中央首长汇报，但不知从什么地方谈起。（装腔作势）我毛著学得不好，斗私批修也做得不够，工作有许多缺点错误，所以就没有把学校工作搞好；运动也不能前进，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不能落实，我感到非常痛心。（把新北大糟蹋得不成样子，早就该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了！）

过去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忙忙乱乱，（忙于和叛徒、特务相勾结）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问题很多，矛盾很多，不知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好，我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毛主席的

希望。（你从不读书，不看报，有一次校文革开会有人念十六条中一段话，你问“是谁写的，不错嘛。”）

关于我自己的缺点、错误，关于我自己的思想改造的情况，我在学习班斗私批修，（你什么时候斗过私？你一斗私，就说中央首长怎么“委屈”你）最近想写个检查，送给中央首长。这里就不讲了。我想谈谈我工作中、运动中的问题。

怎样实现革命大联合，如果没有一个革命大联合，对最高指示没法落实。北大目前的分裂局面，是因为我有许多作得不对的地方，广大同志对我有意见。我计较他们提得高，不拿事实，所以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到井冈山兵团群众中听取意见，非常想去。可是当我一去，他们就没有道理骂人；（造谣、污蔑）不去，就觉得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样我就想，这里面有问题：我想井冈山是如何分裂出去的，井冈山是如何产生的。（是你顽固推行陶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造反派的结果。井冈山是在中央首长的反击“二月逆流”的号召下起来的。）除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外，主要还是关、王、戚、林反党集团制造分裂，利用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企图推翻校文革红色权力机构。井冈山兵团混进了不少坏人，决定了这个组织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提出二次革命、砸烂校文革，一切权力归井冈山。（我们从来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并未结束，现在仍然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所谓“二次革命”之说，乃是诬陷。）

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怎样才能把井冈山的群众和坏人分开，如何团结群众，一致对敌。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先联合，后抓坏人，我想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只要他们放弃砸烂校文革，二次革命的政治纲领，就可以与他们联合。当我去找公社同志商量时，公社就不同意，说井冈山目前不愿放弃他们的政治纲领。不放弃，就不好承认。我不知怎么办好。（公社、文革本来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休想推卸责任！）

春节前，校文革常委、公社负责人我们在一起学习、讨论和井冈山群众联合的问题。正在进行这工作过程中，一部分同志坚决不同意。那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现在，你网罗被井冈山开除出去的廖鲁言的儿媳妇等八条男女拼凑什么“井冈山革造总部”，就

可以吃好睡好了吧！但是这救不了你的命！）我想怎样把井冈山兵团的革命同志挑出来，把井冈山的坏人揪出来，实现大联合。（吃掉井冈山，破坏大联合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

我希望解放军进校，帮助我们搞大联合，我找李钟奇同志谈了几次。前一时期，派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我们搞大联合。解放军来了以后，解放军和我们意见是一致的。（解放军根本没有说井冈山大方向错了）应使井冈山扭转大方向，（大方向始终正确！矛头对准刘邓陶王反动路线，不能扭转，而聂孙公社提出把挖山当作大方向才必须扭转！）他们的矛头不是对准敌人，而是对准校文革，希望他们不要再搞二次革命，他们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就是提方向路线错误也好。（本来就是反动路线嘛！）我们想在校文革领导下，（你不是说“对校文革的指示，正确的执行，不正确的也执行”吗？办不到！）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对待校文革如果认为是白色政权，可以打倒嘛！（正是你说北京市革委会是白色政权）如果班子不理想的话，在联合之后，可以加强校文革权力机构，改叫革委会也好。（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势所趋，不能阻挡！）

后来李钟奇说校文革性质可以讨论，这样一说就说乱了。有的就说是白色政权，有的就说是王任重的私生子。有几个系，东语系、生物系两派群众本来就想联合在一起了，想办学习班了，本来要坐在一起，后来就又退了。解放军在下面说的不一样，（把支左不支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成是两面派，用心何其险恶！）有的解放军说不要校文革领导，井冈山、新北大公社一起办学习班。这样一甩开，这两天，兵团广播台又骂起来，又喊二次革命了。（造谣）今天，又有广播稿，可是今天没带来。

这两天，解放军同志不敢支持校文革，感到不大好办。在学习班的解放军，在小屋子非常明确地支持校文革红色权力机构，但一到群众中就不敢了。（恶毒攻击解放军，决无好下场）在学习班，如何实现大联合，不知怎么做。（不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不知怎么实现大联合，只知一心压垮井冈山！）

这个学习班究竟是集体领导，还是丁国钰、李钟奇几个人领导。（念念不忘一个权字

的资产阶级政客又要夺学习班的领导权了！）听说学习班有个支委会，我也不清楚。听说支委会讨论北大、师大的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支委决议哪里作出也不清楚，我也是个党员，也不了解支委会的情况。

我是一个班长，我也不知道我和大的学习班有什么关系。我是北大班的班长。究竟和学习班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解放军不相信群众，我们稍一动，就说是派性串联，就不敢活动。解放军记小本、盯梢，站在门口偷听我们的会。（污蔑、丑化、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我是有派性，派性是怎么产生的？私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敌人。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派性，另一方面，要联系敌人，不联系敌人，就不能把仇恨记在敌人身上。（你早就该交待你和叛徒、特务及反党集体的黑关系了）

北大、北京高校为什么分成两大派，现在是揭开北京市派性斗争盖子的时候了。（江青同志最近说：“地派的黑手揪出来了，相对好一些；天派抓得少，有后台，还在闹。”现在是向二月逆流派放火开炮，揪出其黑后台的时候了！）

第二次：

揭发一个问题：孙蓬一是个好同志。孙蓬一有严重错误。我们是有分歧的，问题处理不好，吵得很厉害。我对孙蓬一要求是严格的，原则问题是不原谅的，但是整孙蓬一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是敌我矛盾，我也同意打倒。（江青同志早在去年九月说：孙蓬一是坏人，出了许多坏点子，不要再保他了。）

卫戍区现在有他的专案组，据说再有两个问题调查清楚就可以抓起来了。（那是当然，无产阶级专政嘛！）孙蓬一出身贫农，烈士子弟……这个同志阶级立场鲜明，经常犯“左”的错误。（资产阶级立场很鲜明，一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赌博时常常孤注一掷，不怕输得精光）

孙蓬一不能当敌人看，整他的材料是错误的。（坏人的材料就是该整！整得好极了！）

学习班一点自由也没有，有人找孙蓬一就盘问，找我们也是这样。在国际饭店也没有

这样紧张，（国际饭店会议 刘邓彭策划的反革命黑会。聂元梓公然把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举办的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国际饭店反革命黑会相比，真是反动透顶。聂孙之流为哪个阶级服务，为哪个司令部效劳，不是很清楚了吗？你们心中没有鬼紧张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那时还没有登记谁来找你，没有到达这种程度，每天登记，向上面汇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掩盖阶级斗争，掩盖黑手。（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绩巨大，大方向完全正确。采取以攻为守策略，掩盖伸进二月逆流派的黑手正是你们！）

在学习班，不能提加强阶级斗争观点，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最近公社根据总参空军的总结写了标语，贴在学习班，有人说是派性十足，落后。学习班只讲反派性，不讲路线斗争，不讲阶级斗争，学习班中一讲关、王、林，揭黑手，就好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就好象过去我们反潘、吴，就好象反关锋，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关王林是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二月逆流翻案，想吃掉反击二月逆流派是真。）

最近两天我们一天接好几个电话，问是不是聂元梓贴了炮打谢富治的大标语。明天开大会纪念毛主席三·七指示一周年，我要表态，我要讲话，要讲清楚。（言不由衷。在校内鼓励北大公社战士发扬四·一一造反精神，指使小走狗井冈山革造总部贴大标语：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典型的两面派！）那一派反对校文革是由于黑手起作用，（胡说八道！）打倒派性和斩断黑手是不能分开的。

另外在学习班，他们经常骂人，骂我、连女同学都骂，骂破鞋、骂婊子，我们学习班的解放军装着听不见，连汇报都不听。（鲁迅先生说：“现在的批评家，对于‘骂’字也用得非常之模糊。由我说起来，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这是‘骂’，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我指明了有些人的本相，或是婊子，或是叭儿，它们却真的是婊子或叭儿。所以也决不是‘骂’。但论者一概谓之‘骂’，岂不哀哉。”聂元梓在中央首长面前竟然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无耻才能无畏”）■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行